

##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報告

「不夠格家庭？」：台灣同志家庭與子女教育現場之共文化溝通研究(第2年)

報告類別：成果報告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MOST 107-2629-H-128-001-MY2  
執行期間：108年08月01日至110年08月31日  
執行單位：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李佩雯

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郭柏好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張福仁

報告附件：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30 日

中文摘要：家庭認同的建構依賴家庭成員內部彼此之間，以及成員與外部社會之多面向協商。國內外同志研究均指出，同志伴侶面臨少數族群組成家庭之壓力，急需要相關領域學者多方探討來自人際、機構（學校、工作組織、教會）、文化（法律、政策、異性戀中心的價值規範）等不同結構層面對其非傳統家庭形塑之影響。傳播學者 Yep (2002) 曾經透過「內部-外部/個人-群體 (Interior-exterior/individual-collective) 構面所形成的四個象限模組，來分類既有研究已探知的同志議題。據筆者所見，台灣的同志研究大多聚焦於個人層面與內部、外部群體 (individual/interior-exterior) 的生命經驗（例如：同志調適與確認性傾向認同之研究、同志向原生家庭出櫃之研究）。有關同志自組家庭作為一個群體面對內部群體或外部機構 (collective/interior-exterior) 的互動現實則鮮少受關注。尤其是同志自組家庭面對外部社會結構 (collective-exterior) 中組織機關（如：學校、職場）等範疇的溝通現狀，我們目前的理解仍相當淺薄。即便台灣社會近來對於同志群體的支持度已有逐漸提升的趨勢，但整體社會對於同志伴侶進一步養育子女、建立家庭似乎尚存有歧異之見。據此，本研究結合跨文化溝通及性別與溝通之理論視角，藉 Orbe (1998a, 1998b) 之「共文化理論」(Co-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為研究框架，試圖理解台灣同志家庭與外部社會協商溝通以建構家庭認同之歷程。具體而言，本研究欲探知：台灣同志自組家庭如何與其親友以外之外部社會群體、組織協商其非典型家庭認同與社會位置？其過程又可見哪些（共文化）溝通取向 (communication orientations)？其（共文化）溝通策略 (strategies) 為何？而外部社會群體又是如何回應同志家庭所嘗試的（共文化）溝通模式？

中文關鍵詞：同志家庭、家庭認同、多元家庭、共文化理論、認同協商

英文摘要：Previous research on gay community in Taiwan focuses mainly on gay individuals' personal level of adaptation to the mainstream culture (e.g., the formation of homosexual identity, or the coming out strategies to their original families), very little research has looked at the social interaction between same-sex couples and the external society (e.g., schools, workplaces, medical systems, public institutions, living community). Although recently Taiwanese people are becoming more likely to support same-sex marriage, the social view is rather divided regarding whether same-sex couples could have their own children and form their families. As the scholars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indicate, family identity is constructed through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mmunication (Galvin, 2006). In addition to communicating with family members to maintain intimate family relationship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amily members and the external society also deeply aff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family identity. Family identity is not only an internal

relationship process, it is also an interactive process co-created by family members and the external social systems (Huisman, 2014).

Hence, the researcher intends to adopt Mark Orbe's (1998a, 1998b) Co-Cultural Theory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further explore how same-sex couples with children form their family identity by interacting and negotiating with the society as a whole. Specifically, the researcher aims to employ in-depth qualitative interviews (at least 3 times with each family) with 8 recruited gay and lesbian families within two years of time, in order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how do the parents same-sex families negotiate their nontraditional family identity with individuals and professionals in the external social settings? Throughout the process, what are the co-cultural orientations and strategies used by the same-sex parents? And finally, how do the individuals and professionals in the social settings respond to the same-sex parents' co-cultural communication?

英文關鍵詞： family of same-sex parents, family identity, multicultural family, co-cultural theory, identity negotiation

# 家，是動詞： 臺灣育有子女之同志家庭認同建構研究

家無單一化定義、亦非本質性地存在，而是一種認識、理解的框架和日常生活與他人互動、實踐的過程。（謝文宜、曾秀雲，2015：4）

## 壹、 前言

為因應不同的生活型態，有別於傳統核心（nuclear）與延展（extended）家庭模式的多元家庭愈發可見，家庭在功能與結構上皆產生變革。此變化說明了傳統以血緣為判準的親屬關係已不再是唯一的家庭樣貌，人們不乏在血緣家庭之外尋找能夠替代傳統家庭的生活單位，或稱多元家庭。本研究進一步定義，多元家庭指的是在傳統家庭型態之外，衍生出以人與人互相照顧的關係出發，不分血緣親疏而願意一起分享價值與生活資源的親密關係。現代的多元家庭強調的是更有彈性的家庭成員組合，同時以永續、無私的愛與照顧行動所建構出來的物質與情感交互作用下的生存組合（陳慧如、楊幸珍，2010；彭懷真，2003）。

同志家庭乃上述所論多元家庭的種類之一。2019年5月22日司法院大法官通過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並於同年5月24日之後開始實施。法律上同志伴侶的婚姻已取得基本的法律保障，但同志伴侶「無後」的刻板印象在反同人士的操弄之下仍險成國安問題。過去臺灣針對中老年男女同志所做的研究顯示，有一部分同志在進入穩定關係或自訂婚姻關係後，與多數異性戀伴侶一樣完成了繁衍子嗣的人生任務（王增勇 2011；黃靖雯，2011）。此外也有另一部分同志在離開異性婚姻後，與同性伴侶組成繼親家庭，共同養育其伴侶在異性戀婚姻中所生之子女（曾嫻融，2013；趙彥寧，2008）。簡言之，擁有子女的同志家庭在臺灣早已存在，伴隨著人工生殖科技的日新月異，以及社會對於同志議題關注的風氣越加普遍，現今同志族群逐漸不需仰賴先進入異性戀婚姻來完成其生兒育女的人生目標（何思瑩，2014；曾嫻融，2013）。

臺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簡稱同家會）於2005年草創時期（女同志媽媽聯盟 MSN 社群、北區邊緣同志口述歷史工作小組）即有三千多名已經生養小孩，及計畫生育子女的同志加入。至2006年，同家會正式成立時提出三點訴求：「同志父母身分不應影響爭取親權與探視權」、「同志伴侶應可共同收養小孩」、「人工生殖技術不應排除單身或同志」。這十幾年來，同家會接觸過曾進入異性婚姻生育子女而後離婚的女同志母親、藉由人工生殖自行滴精而順利生育子女的同志家庭。目前同家會已接觸超過100個透過人工生殖生養子女的同志家庭，截至2020年底，臺灣來自同志家庭養育的孩子，大約有四百多

位。同婚合法且可收養伴侶具血緣的子女之後，未來應該會有越來越多的同志伴侶，加入生兒育女的行列（王晴怡，2017；吳少喬，2021）。如果社會文化能夠在法治規定來臨的同時，著手鋪建一個安全、友善的環境，看見多元家庭成為社會組成的現實，全面保障不同樣貌的多元家庭，也許才是 748 號釋憲文與施行法意義彰顯之所在。

回頭檢視國內外文獻，學者們過去較少關注間接、結構（institutional）形式的性汙名（sexual stigma）對非異性戀家庭生活所造成的困擾與苦難。在文化層面上，我們的社會仍舊以結構式的性汙名強化權力與位階的不平等，像是對這些非異性戀的個人視而不見，對其身分產生歧視，或是不斷地強調異性戀才是唯一的正常。而諸如此類，無論是因為政府、學校、教會、媒體、與其他機構所做出的歧視行為、欠缺保障、甚至是忽視同性戀個人與家庭，皆可被稱為「結構式的性汙名」（structural sexual stigma）（Kuvalanka, Leslie, & Radina, 2014）。

家庭需要透過內在與外在的溝通（internal and external communication）來建構其家庭認同（family identity）（Galvin, 2006）。除了與家庭成員之間的溝通以維繫親密關係之外，家庭成員與外在社會的互動亦深深影響家庭認同與成員連結之建構。西方的研究指陳，家庭認同並非永久固定不變，而是關乎於每一位家庭成員間所共同適應與創造的家庭故事。家庭認同不僅只是一個內部的關係歷程，它同時也是一個家庭成員與外部的社會脈絡與文化期待互動過後，所建構出位處該社會文化下的認同。因此，家庭認同應該是恆動、互動，產生與維繫一個群體共享之文化意義的溝通過程（Huisman, 2014）。簡言之，家庭認同的形成不會僅限於成員之間的符號互動，它更是全體家庭成員與外部社會文化系統（如：學校、職場）交流過後所形塑出之意義總和。至此，研究者對同志家庭與外部社會如何透過溝通建構出其非典型家庭認同產生好奇，並開始想像本土同志伴侶與子女共組的家庭生活為何樣貌？

誠如前文所言，臺灣正遭逢家庭型態拓展的重要時刻，在同志伴侶甫獲婚姻專法肯認的當下，積極建構一個性別友善的社會環境理當刻不容緩。然而，因為某些反同與宗教人士的阻撓，我們的性別平等運動幾年前遭受重大挫敗，筆者擔憂，同志家庭與其子女，在法律制度、教育、與文化氛圍不明的情境下，是否能夠被看見？抑或是被邊緣、他者化後排除在外？筆者認為，凸顯目前同志家庭的生活處境，將有助於社會大眾、立法與教育單位正視人權與性別平等價值實踐的迫切性與重要性。依循此研究背景與脈絡，本研究試圖探究：在異性戀常規（heteronormativity）、結構式性汙名尚存的社會文化下，同志家長如何嘗試與外界對話與協商其同志家庭認同？而這些外在群體又是如何看待、回應同志家庭非傳統之家庭認同？

## 貳、 文獻探討與評析

筆者檢視國內外同志家庭的相關實證研究發現，同志家庭認同受恐懼同性戀（homophobia）、性傾向歧視（heterosexism）、異性戀常規（heteronormativity）等污名影響甚深。本研究將以 Orbe（1998a）、Orbe & Roberts（2012）的共文化溝通理論（co-cultural theory）作為理解台灣同志家庭與主流權力群體互動之理論框架，最後並提出本研究的具體研究問題。

## 一、 不夠格家庭？本土同志家庭研究

國內探討同志家庭圖像的學術實證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與同志伴侶婚姻權益與伴侶關係經營相關的研究，鉅觀層面側重於政治、法律與社會政策的討論（如：呂欣潔，2018；楊婉瑩，2020），微觀層面則主要探究實質伴侶關係經營、性別角色扮演、及同志與原生家庭之關係維繫（李佩雯，2018；胡郁盈，2017）。謝文宜（2006; Shieh, 2010）的一系列同志伴侶研究發現，臺灣的文化過分注重集體價值的家庭主義，法律制度保障亦不夠完備，同志伴侶關係的延續與經營只能游移在「談戀愛」與「建立婚姻家庭」之間。同志伴侶間往往因為缺乏社會的肯認，而只能依靠兩人不斷在親密關係中彼此承諾，很難進一步論述非傳統「家」的概念。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2：3）〈社會福利政策綱領〉的內容明文指出，政府應積極介入，預防與消除國民因性別、種族、性傾向、婚姻等差異而可能遭遇的歧視。劉安真（2017）針對國內外同性伴侶關係的研究結果也強調，同志伴侶的關係品質與穩定度與異性戀伴侶並無差異，甚至同志伴侶在家務分工上較不受性別角色刻板化影響，且工作分配與生活對待亦較異性戀夫妻更為平權。王慧琦、徐森傑以及伊魯秀一（2017）的研究亦證實，同志家庭教養出來的孩子與異性戀家庭下成長的子女並無實質上的差異。但上述對於同志伴侶與家庭的調查結果及論述，並沒有明顯改變同志伴侶與家庭在社會上相當邊緣化的處境。

同志伴侶經常得面對性少數族群的壓力、內化恐同、出櫃、與原生家庭關係的不確定、缺乏性別角色指引、缺少法律保障等問題。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余秋恩、陳逸 伶、莊蕙綺、藍貝芝、簡舒培，2007）的調查指出，不願生養小孩的女同志有 26.7% 的原因是不願讓孩子承受外在社會壓力，而 Giammatte & Green（2012）的研究也指出，欠缺社會支持是同志伴侶遭遇最困難的議題之一，因為伴侶關係難免在發展過程中遭遇不同挑戰，少了社會支持將使得伴侶關係更加困難，甚至導致關係結束。因此，Rostosky & Riggle（2017）建議，學者在討論同志所面臨的少數族群壓力時，不應該只關注個人層面的議題，而需要探討來自人際、機構（學校、工作組織、教會）、文化（法律、政策、異性戀中心的價值規範）等不同結構層面的影響。

同志伴侶與家庭缺乏社會支持多半涉及大眾的同性戀恐懼（恐同，homophobia）、性傾向歧視（heterosexism）、與異性戀常規（heteronormativity）等心態與價值體系。此三組概念雖然彼此關聯，卻不盡相同。同性戀恐懼，意指對同性戀者非理性的恐懼與敵意，學者認為「同性戀恐懼」這個語詞僅將社會對同性戀的敵意縮小至個人層次，卻忽略恐同的態度其實是社會文化層次上的壓迫。因此後來學術界開始沿用「性傾向歧視」一詞，以指同性戀所遭遇的制度、社會結構與意識型態層面的壓迫。「異性戀常規」則是指一套鞏固異性戀以及傳統家庭價值的性別規範，並認定此價值體系是人類唯一正確的生活方式（劉安真，2017：21-22）。Oswald, Blune, & Marks（2005）認為，異性戀常規對社會生活所造成的干預可分為三個向度：第一，性別角色二分；第二，獨尊異性戀，病理化非異性戀親密關係，反對兒童接受同志教育以及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第三，推崇有血緣關係的一父一母家庭為正常家庭，其他的家庭型態都被貶抑為「不正常」或「偏差」。恐同、性傾向歧視、與異性戀常規都可能造成同志伴侶及其家庭與外部社會連結時的困難，其堆疊而成的意識形態讓社會上不同樣貌的多元家庭，為避免遭受攻擊與傷害，必須隱而不見。

回顧國內僅有同志家庭主題論文，幾乎都聚焦於女同志家庭的生活經驗。早期的研究，如李慈穎（2007）的女同志成家實踐研究，發現女同志的依賴關係，主要以愛和照顧的家務關係為伴侶間是否成「家」的界定，換句話說，傳統父權家庭中被忽略的「女性照顧活動」，在女同志家庭中反而成為定義主體成家的重點價值。該研究最終以「日常生活中的實作式現身」的概念，作為理解女同志家庭實作中的自我認同與關係展演。近幾年婚姻平權運動獲得社會的熱烈討論及關注，同志伴侶對於家庭的想像與實踐愈顯清晰。長期研究同志親密關係的謝文宜和曾秀雲（2015）訪談了長期交往的男女同志伴侶後揭示，有些受訪者以異性戀「一對一」、「愛情、婚姻、家庭」接續的關係發展為目標，要求與異性戀一般平等的家庭論述；另一些受訪者則認為婚姻制度不應該是同志成家的唯一選擇路徑，主張同志家庭圖像的描繪應該不同於異性戀關係中愛情、婚姻、家庭的線性接續關係，試圖改寫異性戀婚姻與家庭關係的思維。謝文宜和曾秀雲強調華人社會婚姻家庭的建立不僅限於法律權益的行使，有些同志家庭的建構在乎的是伴侶雙方是否能相互學習與扶持，是否能落實日常生活實踐伴隨而來的責任與義務。如潘琴葳（2016）的研究所示，當同性婚姻在國內尚未法制化之前，其研究參與者生兒育女需投入的大量資源與心力的歷程，往往等同於他們「成家」的實踐。

進一步探究女同志家庭的親職實作，曾嫻融（2013）的研究發現，異性戀父權體制仍真實深刻地影響著女同志家庭中的生殖與養育行動，尤其是血緣、親屬、親職三位一體的觀念。曾嫻融諷刺的以「不夠格家庭」、「不適任家長」來描述台灣社會眼中的同志家庭，大眾內心的質疑是，就算同志伴侶能夠成家，他們是否能組成一個功能健全，足以支持孩子成長發展的家。其衍生出

來的提問是，什麼樣的家庭「夠格」生養孩子？曾熾融認為，若以異性戀父權體制為標準，單親、隔代教養、多人家庭似乎都不夠格，連經濟文化資本弱勢的外配家庭都被歸在夠格家庭的邊緣地帶。親職在女同志的家庭中並不像異性戀家庭依照血緣直接給定，同志家庭依靠的是親子間的雙向互動，靠其互動對象的肯認（confirm）來確認其親職。女同志媽媽也會策略性地呈現自己為單親家庭，足見目前台灣社會對於同志家庭的汙名，比單親家庭還嚴重。女同志家庭只好以「更好的親職」為職志，企圖證明自己是夠格的家庭。例如：花費更多時間，甚至辭掉工作來陪伴孩子成長、提高孩子的文化資本（學習各種才藝），以確保孩子能順利脫離老師的黑名單、期待表現好的親職能夠順利連結到孩子的好表現（曾熾融，2013）。

獲悉女同志家庭處在不利的社會處境，潘琴葳（2019）從心理諮商的角度探問女同志家長如何透過親職實作來協助子女理解家庭組成、建立家庭認同。結果發現，受訪女同志家長相信堅定的自我認同是關鍵，家長亦須向孩子表明「身為少數未必等於不好」；繼親家長在家庭中的定位也應清楚明確，家長之間的伴侶關係也應言明，幫助孩子理解並接受雙方的伴侶關係；對外揭露同志家庭身份時需要考量環境的安全友善程度、子女的年紀及家庭成員的組成，同時充分對孩子說明在某些情況下，家長留在「櫃內」是為了保護家人；最後女同志線上社群扮演了重要的人際支持網絡，不僅提供主流社會不易獲得的醫療與教養資訊，也可提早為孩子建立友伴關係。此外，妥善選擇繪本與提供家長交往時的照片，伴隨著家長親密關係發展的小故事，亦是幫助孩子理解非典型家庭的重要文本與素材。

從上述國內女同志家庭研究結果可知，社會上崇尚異性戀家庭常規的意識形態，令同志家庭難以自在而平等地發展其多元的家庭想像。許多時候，為了擺脫社會性汙名，同志家庭必須努力仿效類異性戀家庭的樣貌，以達到所謂正常、夠格家庭的標準。筆者欲知，同志家庭在面對外在強大的異性戀中心結構時，是否嘗試以不同的策略與外部組織的成員，例如：學校、職場，政府機構進行同志家庭認同協商？國外的研究成果是否又有可借鑑之處？

## 二、 國外同志家庭與社會互動之研究

美國有多達 370 萬以上的兒童或青少年，其家長之一為 LGBT 的族群；有大約 20 萬的兒童是由同性的雙親所扶養長大（Gates, 2015）。近來不少西方文獻聚焦探討同志家庭認同建構與溝通歷程（Baker, 2019），結果顯示，出櫃是同志家庭中所有成員都必須經歷的過程；換言之，並非僅有同志家長必須面對自己的性傾向揭露，整個家庭的成員都得審慎思考是否對外界揭露或保留這份非傳統的家庭認同（Breshears & DiVerniero, 2015）。



同志家庭收養的孩子向同儕揭露自己非典型的家庭認同似有不一致的做法（Gianino, Goldberg, & Lewis, 2009）。根據 Goldberg（2007）同志家庭子女揭露動機（disclosure motivation）的研究，成年子女對於同性家長的性傾向認同會進行隱私界線管理（boundary control），如：要求家長不要在公開場合有親密行為；只選擇跟幾個親近好朋友訴說家中的情況（selective disclosure）；自己擬定告知身邊朋友自身家庭認同的標準與公式（rules for disclosing identity），像是以提供教育類資訊的方式來試探對方能否接受同性戀。

同樣從同志家庭子女的視角出發，Breshears & DiVerniero（2015）的研究以「溝通隱私管理理論」（communication privacy management theory）的觀點檢視同志家庭與外部的互動。該研究受訪的異性戀婚生子女成年之後並不認為同志家長的性傾向為自己的家庭認同，反倒認為這是家長自己個人的性傾向認同，與自己無太大關聯。受訪者年幼時可能還覺得自己會受到同志家庭認同的影響，但長大有了自己的生活經驗之後，反倒是把這部分資訊的所有權歸給其同志家長，所以對成年後的受訪者來說，這份由異性戀家庭轉為同志家庭的認同是隨著時間不斷改變的（rules and boundaries fluctuate）。因此，該研究中的成年子女不會輕易將同志家庭的資訊透露給家長的交友圈，但對於自己親近的朋友，反而不會過度保密。

儘管美國同志家庭的子女有自己揭露、管理非傳統家庭認同的策略，這些孩子在學校仍可能遭遇間接與結構性的性汙名對待。Kovalanka, Leslie, & Radina（2014）的研究指出，同志家庭的子女在校園學習過程中，容易被忽視（invisibility），學校也很少提及同志家庭正面或中性的資訊，因此同志家庭的孩童在校園經常感覺到自己被排除在許多活動之外，不受鼓勵。這些青少年在學校遭到汙名時的應對策略包括：試圖融入（blend in）主流環境、隱藏同志家庭的秘密（將負面感覺留在自己心中）、忽略（ignore, detach）其他人的汙名行為等。Kovalanka, Leslie, & Radina 建議，提高同志家庭的能見度、多與其他同類家庭聚會，也許能減低這類非典型家庭被邊緣化的情況。

比起明顯的歧視，同志家庭或許更容易遭遇「微歧視」（microaggressions）。Sue et al.（2007）指出三種常見的微歧視：意圖最明顯的「微攻擊」（microassaults）通過辱罵、迴避行為或有目的的歧視行為故意造成明確的傷害。「微侮辱」（microinsults）則是傳達粗鄙、貶低一個人身份的傷人訊息，儘管它們通常是無意的，有時甚至是出於善意，但微侮辱可能會造成嚴重的冒犯與訕笑。最後，「微無效化」（microinvalidations）是否定邊緣化群體的心理思想、感受或現實體驗的一種交流。Haines, Boyer, Giovanazzi, & Galupo（2018）的研究發現，同志家庭成員經常遭遇的微歧視涉及：（1）家庭的正當性，指同志親密關係不是「真的」（real, authentic）關係，只是跟室友或朋友發展出來的關係，因此同志家庭經常被認為不是真的婚姻；（2）違反異性戀主流或宗教家庭價值，因為同志往往被過度性化、指涉為淫亂與刻板化，所以同志家庭成員間在公開場合的情感與肢體表達較容易受限縮；（3）家庭內

的性別角色，指同志家庭缺少一男一女的傳統性別角色成員，所以不被認可為真正的家庭。上述微歧視皆以異性戀常規為審視的標準而衍伸出眾多恐同行為，而同志家庭也因為不符合傳統的性別角色、性別認同、性別表現、與家庭成員組成而易被外界妖魔化。

因為同志家庭認同經常遭受不具正當性的挑戰，西方學者認為同志家庭內的意義建構與論述的建立對於穩定家庭關係具有其重要性（Galvin, 2006）。Baker（2019）長期追蹤並深度訪談男同志家庭的家長後發現，當男同志家長向孩子說明自己的家庭現狀與家庭的意義時，必須面對「傳統家庭結構論述」與「非傳統家庭結構論述」之間的反覆辯證（dialectics）。男同志家長表示，自己的家庭內互動免不了會受到傳統家庭結構論述所干擾與影響。為了協商此辯證，家長傾向以娛樂或輕鬆的策略（entertaining）來論述非傳統家庭結構的功能性和價值，為孩子打造一種「新正常」（new normal）的觀念，經常性地灌輸不一樣的家庭或非傳統的家庭並沒有不好的觀念；或是否定（negating）、遠離以傳統異性戀核心家庭結構為主流的論述趨勢。Breshears（2010）研究女同志家長如何藉由重要的家庭轉捩點（turning points）來為孩子強化自身的家庭認同，結果發掘：第一次跟孩子出櫃、共同面對外界對家庭正當性的挑戰、以及紀念性的婚禮或關係儀式都是成為家庭論述的重要素材經驗。此研究的受訪者也指出每天的家庭對話（everyday conversations）對家庭認同的建立亦相當有助益。

從上述西方社會的研究案例可知，不論是在學校或職場，來自同志非典型家庭的成員，感受到自己缺乏可以談論自身家庭認同的有利論述，於是不得不遠離大家所共享的日常對話，同時建構屬於自己的非傳統家庭意義。社會上存在的那個狹窄的「正常」家庭樣貌，使這些來自不一樣家庭的成員，或被視而不見（invisibility），或被高度注視（hypervisibility）、妖魔化（Dixon & Dougherty, 2014）。而同婚已經通過的臺灣，同志家庭是否也如國外研究所述，無法輕易取得與外部社會對話家庭認同的適當溝通論述與取徑？同志家庭又是如何與外界協商其社會位置？

### 三、溝通理論視角：Mark Orbe 之共文化理論（co-cultural theory）

筆者認為，臺灣同志家庭與主流社會機構、組織之間權力不甚對等的溝通樣態，可採用 Mark Orbe（1998a）的「共文化理論」（co-cultural theory）予以理解。1990 年代中期，跨文化溝通學者 Mark Orbe 開始在組織中展開一系列非裔美人與白人同事之間的跨種族溝通行為研究。其研究緣由與上述同志家庭的經驗雷同，同樣來自於兩造群體中，有一方（非裔美人）強烈感受到與對方交

流時容易產生的困頓與權力不對等。當弱勢群體使用特定的溝通策略，並且有一個特定的目標，希望能夠被強勢群體所接納時（如同志家庭認同），該過程中弱勢群體所使用的策略為何（what）及其如何被使用（how），正是共文化理論所企圖看見的溝通歷程（Bie & Tang, 2016）。

根據 Orbe (1998a) 的定義，共文化溝通 (co-cultural communication) 指的是在社會上處境不利、不被看見的弱勢群體 (underrepresented groups) 與掌握主要權力、優勢群體成員之間的溝通行為。植基於性別研究中的「消音群體理論」(muted group theory) 與「立場理論」(standpoint theory)，共文化理論深究的是，弱勢群體成員與其他相似或不相似的社會成員，協商彼此之間文化差異的過程。因此，這個理論強調的是這些弱勢群體的成員在不同情境脈絡 (context) 之下，如何考量，最終選擇哪些溝通策略與社會上的其他優勢成員進行互動之歷程。

該理論最早在 1998 年提出時，Orbe 系統性地歸納出一系列實際的互動行為（如附錄表 1 所示），其用意並非明確定義或是侷限大家對於弱勢與強勢群體溝通互動的想像，而是給予弱勢群體能夠自主發聲、說出自身處境的機會。換句話說，該理論的重點並不在於定義這些不同的實踐與行為，而是「看見」弱勢群體與強勢群體溝通的整個過程究竟如何進行，之中他們可能遭遇的不平等對待又是如何。

Orbe (1998b) 早期的研究結果，指出了六種可能會影響弱勢群體與掌握社會主要權力的組織或群體間溝通進行的主要因素，包括 (Orbe & Roberts, 2012: 296-298)：

- (一) 預期結果 (preferred outcome)：每一位弱勢群體的成員在面對與強勢群體溝通的情境時往往都會自問：究竟這樣的溝通行為能否達到我想要的預期結果？三種預期結果的形式較常發生：「同化」(assimilation)，遵循強勢群體的生活規則；「適應」(accommodation) 試著去反映共文化群體的生活經驗，能在社會上被接受和取得適當的空間，並達到文化多元性的結果)；「疏離」(separation)，在跨文化互動中與其他共文化群體合作，創造出反映弱勢群體文化規範與價值，維持自我獨特的文化認同。
- (二) 過去經驗 (field of experience)：溝通者過去的生活經驗將會影響其如何抉擇共文化溝通實踐。這些經驗包含家庭的影響、社會化歷程、正式與非正式教育、關鍵事件等。
- (三) 能力 (abilities)：前述表 1 中的各種共文化溝通實踐的發生，端賴弱勢群體溝通者是否具備相符的能力，在合適的個人特質與情節環境下，才能予以實踐。
- (四) 情境脈絡 (situational context)：思考詳細的脈絡與環境因素，以選擇適合的溝通實踐。

- (五) 預知損失與回報 (perceived costs and rewards)：從過去的經驗累積，共文化溝通者可預先判斷某些溝通實踐可能帶來的損失或效益。
- (六) 溝通取徑 (communication approach)：早期的共文化溝通研究指出，弱勢群體可透過三種溝通取徑來表達自己的意見：(1) 非堅定自信的取徑 (nonassertiveness)，指的是個體受制約，不直接面對挑戰，以他人的需求為主以迴避衝突；(2) 堅定自信的取徑 (assertiveness)，意指個體願意表達感受、想法、主張自我的權利，以雙方的利益導向為出發點考量的意見表達；(3) 挑釁的取徑 (aggressiveness)，以強勢、攻擊的手段要求對造考量我方的需求與利益，並忽視對方的需求。

上述的六項因素之間彼此互相影響 (interdependent)，全面整合成一個理解共文化溝通策略選擇的理論架構：

共文化群體成員以其過去經驗 (field of experience) 中對於行為後可能產生損失與回報 (perceived costs and rewards) 的認知為基礎，搭配他們對自我運用的能力 (abilities) 與溝通實踐行為的瞭解，他們會選擇採用某些溝通方向 (communication orientations) — 搭配他們所傾向的預期結果 (preferred outcomes) 及溝通取徑 (communication approaches) — 以適合該特定情境事實 (specific situation) 的策略與其他強勢群體成員溝通。(筆者翻譯，Orbe, 1998b: 19)

這六項要素都是共文化群體成員進行跨文化溝通時的重要準則。其溝通取徑與選擇想要的預期結果，可構成以下九種溝通方向 (communication orientations)：非堅定自信的同化 (nonassertive assimilation)、堅定自信 2 的同化 (assertive assimilation)、侵略性的同化 (aggressive assimilation)、非堅定自信的適應 (nonassertive accommodation)、堅定自信的適應 (assertive accommodation)、侵略性的適應 (aggressive accommodation)、非堅定自信的疏離 (nonassertive separation)、堅定自信的疏離 (assertive separation)、侵略性的疏離 (aggressive separation) (Orbe & Roberts, 2012: 299-301)。請見附錄表 1 中的說明與解釋。

過去以共文化理論做為研究框架的實證研究，通常是針對一共文化在某種特定結構、組織情境下所進行的探討，例如：在美國的穆斯林群體 (Bashir, 2009)、在組織中的非裔美人領導階層 (Hopson & Orbe, 2007)、以及亞裔女性教師在白人為主大學的教學處境 (Lee, 2006)。與本研究尤其相關的是 Camara, Katznelson, Hilderbrandt-Sterling, & Parker (2012) 針對同志群體在美國社會面對性傾向歧視的溝通因應策略。該研究特別著眼於同志群體所遭遇的情境脈絡 (situational context) 與人際偏見 (interpersonal prejudice) 如何影響性傾向歧視互動的因應策略進行探究。作者們強調，西方社會的異性戀中心主義嚴重的邊緣化各種非異性戀的種

族、族群、階級，同志群體最容易遭受歧視的情況通常是在公共領域與陌生人之間的互動。作者建議，同志群體或可先偵測公共場域的性別友善程度，以免遭遇不平等的對待。另外，Bie & Tang (2016) 的研究指出，中國已（異性）婚男同志向身旁的家人親友的出櫃經驗受文化價值觀中的家庭、婚姻與責任感影響至深，因此在中國重視面子（facework）、群體主義（collectivism）與人際關係的脈絡下，他們分析的出櫃故事除了與權力階級（power hierarchy）有關之外，亦傾向符合文化適切性的社會關係維繫模式（culturally appropriate manner），因此不難理解已婚男同志多以堅定自信的同化（assertive assimilation）、堅定自信的適應（assertive accommodation）、及非堅定自信的適應（nonassertive accommodation）為主要溝通方向。

就研究方法而言，過去的研究多採用質性焦點團體或深度訪談的研究方法來蒐集資料進行分析，但也有研究聚焦在蒐集不同的文本（textual analysis）再現出其共文化溝通實踐，如紀錄片（Ramirez-Sanchez, 2008）、街友日記（Harter et al., 2003）。Orbe & Roberts (2012) 坦言，共文化理論主要仍被使用來探究美國國內文化、權力、與溝通之間的關係，但該理論還需要更多世界各地的實證研究文獻，來拓展學者們對於全球其他地方共文化溝通經驗的理解。

綜觀上述，家庭就像是溝通，它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每個家庭之間可能存在許多差異，每個人的生命過程中，也可能出現不只一種家庭型態：例如從傳統核心家庭轉變成單親家庭，又轉變成繼親家庭。個人可能因為不同的生命歷程而進入不同的家庭型態，但是多元型態的家庭卻很少在體制內受到討論。如前文，家庭認同的建構需要內部家庭成員彼此之間，以及成員與外部社會的雙向溝通。國內外同志研究均指出，同志伴侶面臨少數族群組成家庭之壓力，相關學者不應該只關注其個人層面的議題，而需要多方探討來自人際、機構（學校、工作組織、教會）、文化（法律、政策、異性戀中心的價值規範）等不同結構層面對其非傳統家庭的形塑。傳播學者 Yep (2002) 也曾透過「內部—外部／個人—群體（interior-exterior／individual-collective）構面所形成的四個象限來分類既有研究已經探知的同志相關議題。據筆者所見，臺灣的同志研究大多聚焦於個人層面與內部、外部群體（individual/interior-exterior）的互動現實，有關同志作為一個群體（家庭）面對內部組織或外部機構（collective/interior-exterior）的互動現實則較少被探究，尤其是同志家庭面對外部社會結構（collective-exterior）中組織機構（如：學校、職場）那個範疇的溝通現狀與結構性影響，我們目前的理解還相當淺薄。即便台灣社會近來對於同志群體的支持度有逐漸攀升的趨勢，但是整體社會對於同志進一步養育子女、建立家庭似乎尚存有歧異的看法。

是以，本研究藉 Orbe (1998a, 1998b) 植基於權力批判取徑之共文化理論為研究框架，試圖理解台灣同志家庭與外部社會溝通以建構家庭認同之過程。

具體而言，指引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如下：台灣同志家庭與外部組織（如：學校、職場、鄰里社區、公家機構）之間如何協商其非典型家庭認同？其過程又可見哪些共文化溝通取徑與方向？其確切採用的溝通策略為何？

## 叁、研究方法

###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為歷時約兩年的質性深度訪談研究。本研究團隊進行初期曾投入資料檢索，針對同家會過去所出版之訪談及田野資料內容（例如：刊載在《彩虹家庭電子報》的文章與報導），檢閱與本研究相關的資料。此前置作業是為了讓研究團隊熟悉同志家庭在臺灣生活奮鬥的過往脈絡，如此更能幫助研究者進入田野進行深度訪談與觀察。本研究最後透過同家會及臉書上的人際網絡，以滾雪球的方式接觸到全台各地八個同志家庭（表 2），在初步建立關係之後，邀請各家庭其中一位同志家長參與本研究。

本研究中的「同志家長」被定義成是性傾向認同為同性戀或非異性戀的拉媽與 gay 爸，包括曾經進入異性戀婚姻關係生兒育女者，同時已向外部社會群體表明其同志家庭認同或無特別隱瞞者。這五個女同志家庭與三個男同志家庭的居住地分別位在台北、台中、台南、宜蘭，筆者相隔三個月到一年的時間便與參與研究之同志家庭家長會面訪談，不過研究後期（第三次訪談）因為遭遇 Covid-19 疫情，所以部分訪談是以線上語音進行。

第一次深度訪談為「家庭史訪談」（2019 年一月到三月之間），目的在聽取同志家庭的組成歷程，包含同志家長的相遇及其決定共組家庭之細節種種，平均花費 30 分鐘到一小時。第二次深度訪談為「家庭與外部互動經驗訪談」（2019 年四月到六月），重點在開放性地探知同志家庭在生活中與外界群體互動之正面與負面經驗，並聚焦於同志家長（或子女）在這些經驗中如何協商其家庭認同，外部群體又是如何回應之情節，例如：與孩子的學校、自身職場、社區街坊鄰居、醫療院所及公家機構等人員互動之情形，平均花費一到兩小時。第三次深度訪談為「更新現況訪談」（2019 年 12 月到 2020 年二月），當受訪同志家長在前兩次訪談中理解了本研究之目的後，筆者邀請其於生活中加強留意並記錄後續與外部結構互動之經歷，並於第三次訪談中與筆者分享，平均花費一至一個半小時。特別的是，第二次訪談與第三次訪談之間，正逢台灣通過釋字第 748 號施行法，因此筆者亦針對同婚專法通過後，受訪家長所遭遇之社會反饋進行討論。

本研究採行的資料分析方法可分為：（1）描述性分析（**descriptive analysis**）將龐大的資料按其組成劃分為不同類別的過程，目的是從資料中尋索出任何類型、規律性或是主軸；（2）理論性分析（**theoretical analysis**）則是進一步解釋資料中類型的存在，或是解釋研究者所理解到的規律性。本研究結合

上述兩種分析方法，確切的資料分析步驟為：資料管理（data management）、概要地閱讀（overview reading）、類別的澄清（clarification of categories）、與資料的呈現（presentation of data）（Angrosino, 2010，張可婷譯）。

此外，筆者在完成初稿後，採局內人協同參與研究檢閱分析資料的方式，邀請兩位受訪同志家長閱讀本研究之初步分析，並加入研究主題的討論，藉由傾聽、分享與討論對話，不斷地反覆檢視本研究之分析內容，以協助筆者詮釋並回答本計畫所提出之兩組研究問題（謝文宜、曾秀雲，2015）。

## 二、 受訪同志家長背景介紹

表 2: 受訪同志家長資訊

代號／ 年齡	性傾向／婚姻狀態	居住地	職業	子女
y/41	女同志／固定伴侶	台南	自由業	男孩 4 歲（與前夫所生）
a/38	女同志／已婚	宜蘭	自營餐廳	男孩 4 歲（a 所生）、 女孩 1 歲（太太所生）（人工生殖）
m/37	女同志／已婚	台南	醫生	4 歲女孩（太太所生）、 2 歲女孩（m 所生）（人工生殖）
h/42	女同志／固定伴侶	台中	政治工作者	18 歲男孩、12 歲女孩 （與前夫所生）
c/37 i/46	女同志、酷兒／已 婚	新竹	作家、心靈 療癒師	2 個國中生女兒（i 與 前夫所生）
L/43	男同志／約會對象	台北	金融業	3 歲男孩、1 歲女孩 （兩位不同代理孕 母）
T/45	男同志／已婚	台北	醫生	3 歲男孩（代理孕母）
D/46	男同志／約會對象	台北	醫生	4 歲男孩（代理孕母）

註：為方便讀者在後文中辨識受訪同志家長代表的是女同志或男同志家庭，筆者特將女同志家長的代號以英文字母小寫表示，男同志家長的代號則以英文字母大寫表示。婚姻狀態為是否已經合法登記同性婚姻。

y 是一位住在台南育有四歲兒子的單親媽媽，自由業。幾年前與前夫離婚，目前與自己的母親同住。第一次訪談時，她表明心中的家庭圖像是以自己

的母親為主軸，第二次訪談時因為她交往了一位穩定且溫柔體貼的女友，因此心中萌生和女友一起買房子，想要跟她平等地組成一個家的念頭。

**a**和太太目前在宜蘭開餐廳，她們透過自行滴精的方式成功生下一兒一女。太太是宜蘭人，自己的原生家庭則在台中。她所認為家就是兩個相愛的人，一起做決定，讓家一直鞏固延續下去。這個家不一定只限於兩位家長，也不限定性別。**a**和太太跟雙方家人過年的方法很特別，他們會請兩邊家人各選一個時間，然後地點訂在宜蘭與台中中間點的飯店一起過年。

**m**是台北人，目前在台南某醫院擔任主治醫師，與太太分別懷孕生下兩子。跟**a**類似，選擇台南是因為太太的原生家庭在台南，較能取得養育小孩的支持系統。她認為自己的家是由兩個爸爸（生父）和兩個媽媽加兩個小孩所組成。她和太太選擇這兩位男同志爸爸是因為他們承諾不會來爭奪小孩，也不會讓兩位爸爸那邊的家人知道。

**h**住在台中，自認為是一名單親的女同志，目前從事政治工作。家中成員包括一個剛上大學的兒子和小六的女兒（都是與前夫所生），和自己的原生父母。**h**與住在台北的女友關係很穩定，彼此互相信任，可能考慮在幾年後結婚以取得法律的保障。她認為家庭的定義是：有愛、關心、陪伴、支持對方成為他自己，然後共同生活，不一定要有婚姻的羈絆。她過去在異性戀的婚姻中一直很努力地學習當一個好太太、好媽媽，她感覺自己在異性戀婚姻裡比較像一個「任務」，而不是在愛裡面。

**c**和**i**第一次訪談時住在台南，後來又搬到新竹。她倆是在工作上認識的，兩人同為心靈療癒師。有兩個在家自學的青春女兒，女兒們雖然是**i**與前夫所生，但四人之間的關係相當融洽。**i**是第一次進入同性關係，但卻不覺得自己入櫃，一切都坦然看待。**i**說道：「如果你能夠接受自己的不一樣，就可以接受別人的不一樣」。

**L**在外商金融業工作過很長的時間，後來轉到教育界繼承父業。**L**與自己的父母育有一兒一女，透過兩位美國合法的代理孕母。**L**認為如果自己的親密伴侶只願意參與浪漫關係的話，他也能接受。但他自認目前的人生順位是小孩、爸媽、再來才會是情人。第一次訪談時**L**還是單身，但第三次訪談時就出現了固定的交往對象，對方也是位同志爸爸。

**T**已婚，現為新北市開業醫師，與先生在婚前交往了長達 20 年。他們是兩個長期一起生活的同志爸爸，以**T**的精子與美國合法的代孕女性生下一子。**T**的父親從一開始的完全不能接受，到孫子出生之後會不顧一切抱著孫子去拜訪反同的鄰居醫生。讓**T**讚嘆，生小孩似乎成了破除一切反同迷思的最佳證明！

**D**同樣是在台北市執業的主治醫師。他熱心投入各種有關同志爸爸權益推動的講座與活動。令人開心的是，**D**在第三次訪談時透露有了穩定的交往對象，也是一位很想要有自己小孩的男同志。**D**認為像自己這樣有家庭、有小孩的男同志跟社群裡面其他的年輕男同志關懷的重點完全不同。沒有小孩的男同志較少關心法律倡議的問題，所以他花了一番功夫才找到現在的伴侶。

## 肆、研究結果

根據受訪者所提供與外部群體互動之生活經驗，八組家庭傾向以「堅定自信的適應」（assertive accommodation）、「非堅定自信的適應」（nonassertive accommodation）、及「非堅定自信的同化」（nonassertive assimilation）等共文



化溝通方向進行同志家庭認同協商，其所使用之溝通策略詳述如下（Orbe, 1998a; Orbe, 1998b; Orbe & Roberts, 2012）。

## 一、 堅定自信的適應（assertive accommodation）

### 1. 溝通自我策略（communicating self）：社群媒體公開告知

兩位曾經進入異性戀婚姻的受訪者在歷經不同的生命階段轉換之後，重新確認自我的性傾向。她們選擇在社群媒體上發文，以一次性出櫃、真誠開放的方式，來昭告親友自己新的身份與家庭認同。如 y 選擇在自己某一年生日的時候在臉書上出櫃，她認為如此一來自己就無需向親友一一解釋。但是她也承認為顧及母親的面子與請求，自己並未在另一個公眾粉絲團上揭露此消息，因為這個粉絲團上面有不少臉友是母親的朋友。

h 同樣也是利用臉書出櫃，並且從此以後盡情地享受在臉書上發送與伴侶「放閃」照片的樂趣：

我現在在做的就是，爭取權益或者是讓大家知道「我們沒有不同」。所以「放閃」也是一種倡議！我媽她就說這樣人家不會覺得我們有一點太超過嗎？我說哪裡超過？那賈靜雯[放閃姐弟戀]不超過嗎？為什麼她這樣子的愛情就被讚爆，那我們為什麼不行？我說到底這個社會是怎麼看待我們？所以我現在的立場其實踩的很硬啦，然後我的心理素質也比較強。（h）

其實 h 離婚之前受了很多苦都隱忍不說，她表示離婚後就決定不想再隱瞞自己的處境了。她也提到，自己當初對揭露「離婚」的消息相當恐懼，擔心他人批判離婚後的自己，結果證明她在公開自己離婚的身份後，反而還贏得更多友情。所以後來她比較不害怕他人的眼光，其實許多自己想像的恐懼，並沒有真的發生。y 和 h 都指出，自己在臉書上的出櫃得到的臉友回應，偏正向支持，她們猜測可能有負面觀感的朋友，也因為整個社會的氛圍和性別平等的趨勢而不願輕易表態。

### 2. 內群體人際網絡互動策略（intragroup networking）：嘗試加入女同志圈內的線上群組

研究指出，性少數在社會上遭遇的歧視多數來自陌生人或公共領域的互動，建議同志家長善用圈內（in-group）社群資源，為孩子尋找人際網絡，維持家庭認同的發展（Breshears & Beer, 2014; Camara, Katznelson, Hilderbrandt-Sterling, & Parker, 2012）。女同志受訪家長也期待自己能在共文化圈內的社群媒體群組中找到互相支持的同伴，但有時卻事與願違。

y 在接受訪談時不斷強調希望自己在女同志線上群組（Line 和 PTT）中被「霸凌」的經驗和尋找同性伴侶的高度困難能夠被看見。y 在離開異性戀婚姻

後嘗試透過女同志線上群組交友，可惜的是，當她向群組內的成員表明自己曾經進入異性戀婚姻之後，遭受了不少冷嘲熱諷與負面的回應。

很多人會覺得，妳是不是（異性戀）婚姻不幸才會想要來找女生？妳是不是因為離婚，所以才找女生？就覺得男生造成妳很多傷害。我覺得拉媽背負很多這種刻板印象跟罪名。（y）

y 加入女同志社群後經常被噓，在 PTT 的拉版上也被質疑是上線來找 T 幫忙養小孩。種種酸言酸語內化導致 y 一再懷疑「自己不夠格」重建自己的同志家庭，不夠格擁有同性伴侶。y 強調在這個社會的性少數群體中，自己位處最受污名、最底層的那一種。為了平反，她創了一個「拉媽版」，試圖創造屬於自己的社群，號召和自己一樣的拉媽加入。

我去拉版，就發了一個文，我說我是一個拉媽，就是我曾經有跟異性戀結婚過，那現在我自己帶孩子，我離婚了。我要找跟我一樣，也許妳還在婚姻裡面，妳很痛苦，也許妳正準備要離婚，妳不知道找誰講。又或者也許妳已經離婚了，可是妳自己帶著孩子，妳不得不假裝成妳是異性戀。我覺得不管妳是哪一個處境，我希望我們可以集結起來。在這個群組，妳潛水沒有關係，妳半年不講話我都不會踢妳走，可是如果有一天妳真的覺得很痛苦了，很想講這件事，我們會在這邊。（y）

女同志社群中有些人認為像 y 這樣曾經進入異性戀婚姻，又育有年幼小孩的女同志「不純」、「不配尋找伴」，甚至反對單身的女同志幫拉媽養育異性戀的小孩。y 努力地想克服女同志圈將她的小孩歸為「血統不純正」，訪談間透露出內心過不去那個「真的」女同志家庭的定義、「怕被嫌髒」等外界說法，深覺自己好似永遠無法符合組成女同志家庭的資格。h 同為拉媽，她的伴侶解釋這個現象的根源，她說有些待過異性戀婚姻的拉媽在圈內遭質疑，因為過去有不少婆因為抵不住主流社會的壓力，最後放棄原先的同性關係，投向異性戀婚姻。

臺灣同婚專法通過之前，Brainer（2021）的研究調查指出，臺灣其實有不少年長的同志曾進入異性戀婚姻生兒育女。這群人後來有些離婚、喪偶，或是以特殊的「家庭朋友」（family friends）的形式，與同性伴侶的家人小孩產生一種無血緣的緊密連結關係，甚至共同扶養伴侶的異性戀婚姻子女長大成人。如 Brainer 所述，大部分的年輕同志可能難以想像，對於這些較為年長的同志來說，家人的價值、對自己原生父母的尊敬與愛（filial values and love and respect for her parents），都是他們決定進入異性戀婚姻的重要原因。身為獨生女的 y 在大學時期就跟媽媽出櫃，三十歲左右的時候因為母親以異性戀婚姻定義她作

為「好女兒」的親屬角色（Kam, 2013），而決定為母親試一次異性戀婚姻。因此，一般人能做的是避免假設所有人的行動皆能與其性傾向認同相符，因為這個社會上其實存在著不少不得不進入異性戀家庭，但也同時發展著同性戀關係的人們（Brainer, 2021）。

被女同志社群質疑為「非典型中的非典型」家庭的還有 c。她和曾經進入異性戀婚姻的太太 i 表示，她們經常被挑戰「不是真的女同志關係」，因為她們的處境「不夠可憐」、「不夠辛苦」、「沒有太多被欺負的經驗」，所以不能算是女同志家庭。i 認為自己愛的是一個人而不是那個人的性別，她並未經歷過一般女同志從小到大必須承受的苦，她和 c 也沒有經歷過做小孩的苦，等同於彼此「撿到便宜」。所以她們在女同志家庭私密社團經常被問到「那妳們有去登記嗎？」彷彿堅定的女同志關係完全取決於有無婚姻關係（Lannutti, 2018）。c 與 i 無奈地表示，有一種「被自己人推開」的感覺。針對所謂「不純」的討論，a 提到，加入同志媽媽社團的篩選機制嚴格，因為她們不想被打擾。成員一定得拿到媽媽手冊，而且需要推薦人。曾經進入異性戀家庭的新成員，就會在會內接受評估，包括與同性伴侶交往的時間、是否有法律登記等。a 指出在女同志圈內，如果從未跟異性交往過，尤其是婆，會給人比較高的信任與評價。

上述發現與潘琴葳（2019）的研究結果並不一致。潘琴葳發現社群為女同志家長提供了訊息傳遞、情感支持，同時肯認同志與家長雙重身分，給予孩子同儕的重要功能。究其因可能是該研究所調查的幾乎是伴侶共同計劃生育的女同志家庭（planned lesbian families），同質性高，其所遭遇的困難與組成家庭的過程也類似，其與本研究中曾經進入過異性戀婚姻的單親女同志家長處境不同，雖然女同志家庭型態以繼親家庭（lesbian stepfamilies）居多（洪于珊，2012）。另外，Kelly（2011）曾為文提醒，法律上的重整可能強化現有的家庭型態與常規，而排除大眾刻板印象以外的其他多元組成的同志家庭。故，本土女同志家庭私密社團目前的做法必須小心落入一種強化單一女同志家庭型態的同性家庭正典，而排擠了其他家庭組成的可能與樣貌。

T 表示，男同志社群似乎較少對曾經進入異性戀婚姻者產生排斥。他反倒覺得如果願意離開異性戀婚姻，投入同性關係是件好事，例如某位離開異性戀婚姻的男同志 youtuber（男生宿舍），在男同志圈就頗受歡迎。然而 D 觀察到，男同志在圈內社團必須面對的是針對「（繼親收）養父的污名」，亦即血緣中心論。有些男同志的原生家庭認為未付出代孕資本生小孩的同志伴侶，也就是收養孩子的無血緣養父，好像成了那個來搶孫子、未來可能爭奪財產的人，與 c 所說的「撿便宜」似有類似之處。有趣的對比出現在曾熾融（2019）的研究。她的受訪者之一雖是同志家人孩子的血緣父親，但他一直覺得自己只是孩子的叔叔，他的經驗證澄，血緣作為親屬認定及親情發生的來源並非天生自然，與其說血緣直接導致親情，不如說持續實踐的親職才是產生親情的原因。

簡言之，同志家庭並不會無條件跳脫父權文化的影響，同志家庭亦可能落入異性戀婚姻框架中的父系繼承窠臼，其反映出與階級權力、與父權體制中的從父姓、繼承父方的血緣及家族遺產相關的性別化思維（Dempsey, 2013）。無論是西方或台灣的同婚運動，帳面上的論述強調的幾乎都是「個人選擇」（individual choices）而輕描淡寫了同志婚姻或同志家庭仍然無法避免的父權優勢與直接血緣之爭（patrilineal reproduction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male power and privilege）（Brainer, 2021）。

### 3. 溝通自我與教育他人策略（communicating self and educating others）：回應外界提問，以對話釐清觀念

本研究的女同志受訪者 m、h、a 都曾經接受全國性與地方性新聞報導，談論自己的同志家庭。她們與自己的伴侶都有心藉溝通自我與教育他人的策略增加同志家庭在媒體上的能見度，盡己之力進行社會運動。雖然必須犧牲自己的隱私，但是透過電視節目的深度報導，觀眾得以更深層地理解同志家庭型態。內容包括介紹女同志的懷孕科技，早期為自行滴精（self-insemination），現在比較常見的是體外受精（in vitro fertilization, IVF）。

臺灣同婚專法已經通過，然因社會既存的異性戀常規結構，同志家長們仍經常遭遇「慢性暴力」（slow violence）的處境（Moreira, 2019）。本研究中許多受訪者在回應外界的提問或質疑時，皆嘗試達到觀念釐清的教育功能，例如性傾向、性別角色、親職角色等概念說明。從他們所揭露的經驗中不難發現台灣民眾受「性別二分」與「異性戀常規」的意識形態所綁架。舉例來說，h 女兒的學校老師在臉書上得知 h 是女同志之後，私底下跟女兒說「妳媽媽的事情盡量不要告訴別人，這樣子比較好」。雖然老師的用意是想保護女兒不受其他同學霸凌，但是 h 最後把女兒向外界建構自己身在同志家庭的權利留給女兒，她相信與其躲藏，同志家長對孩子的教育、給孩子建立的自信心，會影響孩子如何去面對外界的眼光。

孩子的人際關係，還有他父母的社經背景，他自己對他自己的自信這個東西，都有關係。比方說當我不覺得這件事情有問題，你不需要因為這件事情覺得羞恥，如果有人因為這樣那你就跟我說，我們做一件事情是坦然的時，他對這件事情他就沒有那個壓抑、擔心、害怕。所以他在人際之間的互動，他展現的不會那麼畏縮，他被霸凌的機會也會小。然後還有因為我從小一到小四，因為小五小六就沒有那個晨光媽媽了，我都有去他們班上說故事，所以我會讓他們班上的同學認識我，然後他們對我有一個認識跟理解跟喜歡我這件事情，我覺得也會讓我們比較有機會跟他們班上的同學親近、理解（單親家庭），那個也會讓小孩比較安全。（h）

面對女兒的同班同學，h 採取面對面說理教育的方式來傳遞「單親家庭沒有問題」的訊息，甚至只要學校允許她也很願意去談同志家庭。如同吳少喬

(2021) 感嘆同志家庭不被學校看見一般，女兒學校的家長們不願讓她的家庭在教室正式出櫃，她只好藉由每星期一次的晨光時間，以「真實存在」的出現，讓孩子們看見「不一樣」的家。本土的經驗與知名 Gay 爸陳子良在美國的同志親職經驗不同。美國大約有一百多萬個同志家庭，11%是男同志爸爸，30%是女同志媽媽。陳子良會不斷主動與學校洽商，建議學校將同志家庭元素加入學校的家庭教育單元內容。他也建議在教育現場推行同志教育應該循序漸進，先從班級開始，從小團體到大團體，最後才擴及校園整體（孫子靖和陳振豪，2019）。

h 和 m 都提到因為自己的社經地位，致使職場同事不敢挑戰自己的同志身份。m 身為醫生，由於位階的差異，與自己合作的護理師對其同志家庭的身份欣然接受，一切都很自然。但 m 坦白還是會等自己在職場上的位置比較鞏固後，才願意多所揭露自己的家庭認同。她也發現醫院裡的的基督徒長官對於其家庭認同的回應運用「階段性」循序漸進的方式，一開始不願回應，採 don't ask don't tell 的策略，後來才慢慢接受。

m 的身份挑戰主要來自陌生人對她外在性別表現（gender presentation）的挑戰。看起來偏中性帥氣的她曾在選舉造勢場合遭陌生人微歧視（Haines et al., 2018; Sue et al., 2007）：「妳們是同志家庭喔？」「妳是公的還是母的？啊，妳推娃娃車，妳是母的。」m 當下盡量表現溫和，並試圖機會教育，邀請對方來認識自己的家人。遺憾的是對方不願對話，撂下此言後立刻走閃。此事件後來對 m 的太太造成極大的陰影與不安全感，甚至影響她們的婚姻。m 的太太對於大環境對同志的歧視非常敏感，她曾剪斷反同立委參選人在街上架設的布條，上面寫著「我想要抱孫，人類會滅絕」等歧視字眼。m 的太太很憤怒地表示，還好小孩不識字，不然「小孩會怎麼回頭看自己的家」？為了消泯內心的不安，太太主張自己和 m 必須犧牲私人的時間全心教養小孩，讓小孩將來不會抱怨「為何生下我」的機會。但是該想法卻讓 m 與太太在教養上產生了莫大的衝突，因為 m 不願放棄個人生活與研究所的學業。曾熾融（2019）指出，不受社會肯認所造成的焦慮迫使女同志家長只能依靠強化親職照顧，以肯認自身家庭的正當性。更甚者會不斷挹注資源來創造孩子在學業和教育上的優勢，以防孩子受外界不友善的對待。

我太太認為只要我所有時間都花在小孩身上，小孩長大後別人質疑我的小孩說你的家不好的時候，小孩就可以說沒有，我的媽媽跟媽咪都非常非常愛我。所以我太太的途徑就是這樣，就是把母職扛在肩上，然後對我來講這是一個枷鎖。（m）

社會過度刻板的性別二分與性別表現想像，還出現在 m、c 及 a 的伴侶的親職角色經驗上。她們三位因為外型打扮偏中性，經常被質疑到底是孩子的爸爸還是媽媽。例如家電送貨員堅持叫 c「爸爸」；當 c 和 i 去登記結婚時，戶政機關的人稱呼 c「李先生」。因為不勝其擾，c 的繼親女兒在學校主動告知老師和同學：「這位是 c，她是我的家人」，希望能夠引導大家跳脫「爸爸或媽媽」傳統親職二分的稱謂。性別二分的刻板觀念連帶影響人們性別分工的認知。a 的伴侶外型中性，因此有任何粗重活，鄰居都認為應該是 a 的伴侶負責。面對這些性別刻板所延伸出的疑問，受訪者們必須耐心說明、教育提問的

外界人士。只是短時間要讓外界放棄性別二分與異性戀中心的思考方式，並不容易。

異性戀家庭為主流的觀念亦使校方質疑受訪的男同志家庭欠缺母親的角色。L 選擇先向兒子的幼稚園出櫃，看校方如何因應同志家庭，以避免孩子一直被問「媽媽呢？」學校通常都會回應單親家庭不是問題，但是卻避而不談男同志爸爸的家庭認同。L 跟目前兒子的老師建議，如果上課時提到媽媽的時候請以「主要照顧者」這樣的說法取代，希望孩子對於家庭成員的想像不會困在主流家庭的性別角色窠臼之中。研究指出，有些女同志家長會選擇對外告知自己的家庭是由兩個母親組成，避免落入「沒有爸爸」的異性戀本位思維，甚至強調供精者為捐精者，不是爸爸（潘琴葳，2019）。

本來 T 和兒子學校老師一開始處於一種心照不宣的狀態，過了一段時間 T 主動找學校老師說明同志家庭的身份，並與老師們展開來回討論，共同建構他們的同志家庭認同。老師們非常用心，在 T 尚未釐清同志家庭身份前，會私下告知孩子：「雖然你沒有媽媽，但是你的爸爸跟爹地都很愛你。」T 後來得知其實老師們早就從寶寶手冊上知道了 T 是同志家庭的爸爸，只是老師們不確定孩子是代孕。

老師有先跟我們談論之後可以怎麼樣去跟孩子說他孩子身世的狀況。老師有提醒我們在家裡跟在外面，面對外人的態度是要一致。我們在家裡的稱謂是「爸爸」跟「爹地」，那帶著孩子在有外人的狀況，我們也必須是爸爸跟爹地，不是變成爸爸跟「叔叔」之類的。那一天回家之後，老師也有傳訊息給我，她訊息裡面有一些他們在學校的繪本，就把它拍下來給我們看。其中就有一本叫做「家庭大不同」，就是他們在學校會給小朋友看的繪本，裡面有提到有些家庭，會是有一個爸爸一個媽媽的，有些家庭只有一個爸爸、一個媽媽、兩個爸爸、兩個媽媽，會有這樣子的繪本。讓我知道他們在學校會怎樣處理這個部分。（T）

T 認為老師們尚在摸索如何教育這樣的孩子，但老師們懂得跳脫性別二分，在特殊節日的時候（例如母親節），告知學生和家長兩個爸爸也同時可以是兩個媽媽。老師們也鼓勵 T 和伴侶自然地參與學校舉辦的活動，與其他家長互動，無需躲藏。

#### 4. 教育他人並逐步改造異性戀家庭常規策略（educating others and transforming heteronormativity）：尋求法律保障家人身份，凸顯體制不足

本研究在訪談期間適逢同婚專法通過，意義特殊。即便有幾個受訪家庭尚未登記結婚，但是他們表示有了法律的保障，自己和家人也變得比過去更有自信，能夠更自然地面對社區的鄰居與社會外界的眼光。D 認為同婚通過之後，學校或其他行業（例如婚禮相關產業、婚紗、蜜月旅行）開始看到商機，所以社會的氛圍跟同婚通過之前很不一樣。

最積極的大概就是那個非營利幼兒園，他就直接請我們（男同志父親）去分享。他就說你們就來，因為他們好像有收到我們自己同志社團內的小朋友。好像是一對雙胞胎，女同志的雙胞胎，他們剛好要進去。他們非營利基金會現在好像有六個還八個幼兒園，有一天他們一起做教育訓練，他們就請我們同志家庭去分享。（D）

m、c 和 a 都在同婚專法施行後立刻登記結婚，不過她們透過法律肯認家庭的過程仍有些微不同。m 登記結婚的時候察覺台北市公家機關的服務人員還算是友善，不過 105 年時他和太太登記為法定伴侶的經驗倒是有點冷清。當時身旁的異性戀伴侶在戶政機關登記結婚時，會自動有志工來幫忙拍照和慶祝，但身為同性伴侶的她們就沒有這樣的福利，還得自己硬著頭皮去找人來協助拍照，儼然成了對照組。a 和太太在宜蘭登記結婚，她發現小地方像他們這樣的伴侶並不多，因此公家機關在進行法律程序時步驟並不熟悉，特別小心翼翼，深怕冒犯到她們。

另一個更明顯的城鄉差距顯現在男同志家庭將代孕的子女入籍的程序上。據 T、L、D 的經驗指出，除了台北市大安區以外，其他地區的戶政單位通常都會以台灣目前不承認代孕，來婉拒處理入籍事宜，引來男同志圈「一國多制」的疑慮。目前中南部的男同志家庭若要申請代孕子女入籍，必須花一天時間到大安區，依照前人所使用的教戰守則來完成所有的程序：先做親子鑑定，再到移民署入台灣籍，最後回到戶政機關辦健保卡。過去不少爸爸曾在移民署那一關被移民官挑戰「我怎麼知道孩子是你的？」，後來才發展出先驗 DNA 的流程。陳嘉好和余振民（2021）整理相關報導後發現，台灣同志家庭申請收養的標準與異性戀家庭不同，曾有女同志家長的申請因「婚齡過短」為由被駁回，男同志家長也被要求做親子鑑定，繁瑣的程序不但耗損收養家長的時間精神，也反映出裁決官對於同志家庭的瞭解不足。

研究指出，女同志對於臺灣同婚通過能夠為同志家庭帶來的保障存疑，她們認為法律制度也無法自動根除同志生活所要經歷的歧視與不便（Chen & Wang, 2010; Friedman & Chen, 2021）。即使在法律上是家人，但生活實踐上仍有些跟不上的地方需要受訪者們積極主動發聲與改造。如 Ching（2010：4）所言，性少數必須在常規（normativity）的兩個層次上游移，一方面是評估或挑戰本身就存在多重意義與矛盾的「正常」作為一種可能性，另一方面同時改造「正常」成為一種可能」（*assessing 'normal' as a possibility and transforming 'normal' into 'possible'*）。換言之，性少數在日常生活中必須一方面檢驗以異性戀為準則的正典是否合理，一方面改變、創造出適合性少數的常規。m 和太太前幾年登記為法定伴侶後，適逢調換醫院單位，當時新單位的院長在他剛到職為全家申請宿舍時勸戒她要「低調」，院長的說法是「小地方不要張揚這種事」，並指明「宿舍還是要跟家人同住最好」。m 當下並未理會，照樣填寫太太為家人來申請宿舍。a 的經驗則是帶小孩看小兒科時，主動將表格上的「先

生」或「爸爸」一欄改成「伴侶」或「家長」。母親節時，a 女兒的學校要求交「一張」母親的照片，a 和伴侶自動繳交兩張照片，作為提醒校方與老師多元家庭存在的方法。T 指出台灣的媽媽手冊或寶寶手冊，亦即填寫孩子疫苗施打紀錄的文件，只能輸入媽媽的名字和身分證字號，這個規則是目前他覺得最不方便，也認為極需要改革的體制規定。

## 二、非堅定自信的適應 (nonassertive accommodation)

### 1. 提高能見度與消除刻板印象策略 (increasing visibility and dispelling stereotypes)：以行動示人，展現家庭互動與組成

面對不知情的外界，好幾位受訪者傾向先不表明同志家庭認同的身份，而是從日常往來或工作服務的過程中讓對方看見自己 (the process of making you see)、接納自己 (不是牛鬼蛇神)，然後自然地發現他們原來是同志家庭 (Friedman & Chen, 2021: 571)。筆者認為此與華人傳統社會關係中的含蓄政治 (politics of reticence) 與默言寬容的文化思維有關，也就是透過非西方、非直言揭露式的認同實踐，來換取外界社會關係中對其非常規家庭型態的默許。這樣的行動並非意圖隱藏同志家庭認同，而是以關係互動維繫為前提，撐出同志家庭被看見的可能性 (李佩雯, 2018; 胡郁盈, 2017; Liu & Ding, 2005)。

例如開餐廳的 a 和太太待人和善，她們一開始也不多介紹自己，而是讓鄰里、顧客慢慢認識他們是怎樣的家庭。m 參加太太的員工旅行時，自覺不需要透過言語出櫃，而是直接以行動示人，如異性戀家庭一般，大家心知肚明、心照不宣 (tacit subject) (Acosta, 2011; Decena, 2008)。m 太太的老闆，雖然看著 m 說不出口女朋友或太太這樣的字眼，但是行動上卻是讓 m 比照眷屬，參與尾牙抽獎。

c 和太太 i 認為自然地與大眾互動，有助於「撕標籤」。菜市場裡雖然有很多閒言閒語，但 i 覺得大家都是鄰居沒有必要交惡，所以選擇繼續自然地互動。她們發現臺灣人喜歡透過行動來表達善意，例如菜市場賣花枝羹的阿伯，對她們一家人噓寒問暖，態度親切。I 自認「沒有櫃子」，因此不必要一直懷疑其他人是不是對自己有敵意，強調自己願意給對方時間去理解、調整心態，也會教孩子如何剔除自己身上的標籤，她稱之為「家庭內功」。比方說從學校老師對女兒翻白眼，不給她們西瓜吃的事件中教孩子去反思整個事情的始末，去撕掉自己身上的標籤：

我問女兒們，那妳要接受一個跟妳翻白眼，不給妳西瓜的人，還是妳真的開心去接受學弟妹愛妳們，然後大家都把他們的西瓜拿來分給妳們吃？對，其實妳看事件的角度是可以不一樣的。(I)



c 解釋自己和 i 的認同建構歷程不同。她因為性傾向認同曾經進入櫃中，但是逐步透過解構的過程才能夠像現在一樣，不再用負面的態度看待她和家人生活上所遭遇的挑戰。她認為這樣的結果不是一開始就能辦到的，建構自身的同志家庭認同是一圈一圈慢慢往上繞過的歷程：先自我肯認，然後再去面對他人。

肯認自我不是一個好像單一的、很表面的，它是繞過一圈的。我也曾經跟你一樣想法，可是我慢慢改變我自己身為同志這件事情的認知。然後，我重新來回去定義身為同志這件事。對，我不覺得同志是有病的，或者是，同志需要改變，或是同志就應該要有一個櫃子，或是同志就應該要被歧視。它是有一個這樣子的過程，它比較像是一個螺旋這樣上去的，可能從上面的角度來看，它還是在同一個點，但是其實它是這樣子繞上去。然後自我肯認，同意我們都是自然的。（c）

i 也不斷強調一定要先修復自己，清楚自己的內在信念想法與自我認知，因為我們自己是什麼樣子，我們所共振出去然後收到的外界回應與社會，就會是什麼樣子。

受訪的男同志家長因為擔憂自己的同志家庭身份不被外界接受，往往不選擇事先向周遭口頭揭露，而是帶著孩子展現新的家庭型態。L 生了小孩後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直接牽著兒子走進公司，結果女同事們都很驚訝，但是紛紛表達有小孩是好事，有家庭責任感的男同志很容易被加分。如過去的研究顯示，「孫子」（小孩）的出現成功地轉圜了出櫃女同志與原生家庭之間的關係，亦可減輕同志婚姻與家庭缺乏正當性的質疑（曾熾融，2013，2019；Lannutti, 2014）。不過 L 的同事還是會擔心他是單親同志家庭，小孩又是混血兒沒有媽媽，是否容易被歧視等。L 坦言很多同志爸爸在找卵母時都有這些擔憂，甚至會因此特別找亞洲卵母，但 L 也有一套自己的想法：

這個孩子，我又不可能讓他一輩子在一個無菌的環境，我覺得我應該要做的事反而是要讓他夠 strong in mind，讓他知道說爸爸會 support 他、支持他。我自己現在養他到兩歲半，我覺得陪伴的這個角色反而是比較重要的，不要分它是來自於爸爸還是媽媽。我覺得這個核心就是抽離性別，陪伴不是一定來自於母親或父親這樣子。（L）

L 家人的朋友來家裡玩時，兒子一直在哭，他們便斷言是因為沒有媽媽的氣味和心跳來穩定孩子。Goldberg（2010）與 Goldberg & Smith（2011）指出，女同志家庭的家長也經常被質疑「沒有父親」或是「缺乏男性角色典範」來反對其養育孩子。外界這樣的質疑和過度擔憂很可能間接造成同志家長內化異性戀常規（heteronormativity），內化恐同，對於非典型的親職角色與性別角色缺乏信心，最終影響子女的發展與家庭認同的建構（曾熾融，2013；Goldberg &

Smith, 2011; Robinson & Brewster, 2014)。所幸 L 對自己的親職與陪伴深具信心，並未受他人的猜測與評斷干擾其家庭認同的構築。

### 三、 非堅定自信的同化 (nonassertive assimilation)

#### 1. 強調與主流群體的共同點與避免爭議策略 (emphasizing commonalities and averting controversy)：漸進式揭露家庭內涵，適時捍衛同志權益

前文提及，外界對於本研究同志家庭認同接納有些採階段性進行，其實受訪家長在建構自己的家庭認同時，也可能採漸進、階段式策略。比方有些受訪者並不願意在情況不明的狀態下跟小孩的學校揭露自己是同志家庭，一來是因為自己當下並沒有親密關係伴侶，二來是還不確定學校對同志家庭是否會產生惡意。如曾嫻融 (2013) 與潘琴葳 (2019) 研究中的女同志家長所言，如果家長評估現實環境的友善程度將會造成出櫃後的不利後果，則家長們通常會在確認職場和 (通常是幼小孩子) 學校的狀況後，決定不主動提起自己是同志家庭。但是這樣的抉擇亦可能造成家庭認同建構上的兩難，因為家長也會擔憂孩子誤以為自己不正常，才會需要被隱瞞。

幾位受訪家長起初以「單親家庭」的說法來測試校方的反應。y 目前只跟小孩學校老師和家長揭露自己是單親，因為孩子身在一個基督教偏保守的幼稚園。雖並未跟兒子幼稚園的老師明說，但是 y 曾經在老師和家長的群組當中和老師以及兩三位男家長的恐同言論辯論起來，當時她僅以「一個支持同志權益的家長」的形象來捍衛自己的性傾向和家庭認同。

D 在幫兒子找學校時會語帶保留地強調自己是單親，欲以試探校方會如何回應與照顧單親的小孩。D 曾經跟三家幼兒園談過，其中兩個比較老派傳統的幼稚園園長回應：「小孩成長不能沒有媽媽」，甚至質疑 D「你怎麼可以跟媽媽沒有聯繫？」「你應該要跟小孩說媽媽在美國啊，在工作啊？」

社群裡的其他爸爸問我怎麼處理這件事，我就直接開門見山跟學校說，我們家沒有媽媽這件事。然後那些爸爸就說，可是他們家那邊的學校很保守。我說，保守更要講啊，如果遇到那些不是很友善的，你就想辦法換一家。你覺得沒有怎樣對不對？然後要創造一個虛擬的媽媽出來給你小孩，然後呢？那我說，哪一年你小孩七歲的時候發現，這根本是虛擬的，他會恨你一輩子。(D)

D 不認同對孩子編造謊言以符合異性戀中心的家庭組成形態，他認為環境越是保守越要讓學校知道自己是非典型家庭，但是 D 尚不願與學校觸碰其同志家庭身份。有部分原因是訪談當時 he 還是單身，他認為那個情況下並沒有向學校主動出櫃的必要性。其實同志家長找學校時最擔心的是像吳少喬 (2021) 所說，

有些校方會在面試時向家長保證同志家庭「與一般家庭沒有不同」，但後來學校卻真的無視少數家庭的不同，無法尊重其差異與需求。

## 六、結論與討論

本土同志家庭研究欠缺男同志家庭經驗的探查。本研究募集了臺灣北、中、南八個不同型態的男女同志家庭，以受訪同志家庭與外部群體協商家庭認同的生活經驗，試圖理解同志家庭遭遇的結構式性污名（Kuvallanka, Leslie, & Radina, 2014）。研究結果顯示受訪家長與外界群體協商家庭認同受性別、性傾向、性別表現、職業階級、血緣等因素的交織（intersectionality）影響，其採用的共文化溝通方向概分三類：堅定自信的適應、非堅定自信的適應、非堅定自信的同化；在華人的文化脈絡下較少見侵略性（aggressive）的協商取徑，其所欲達成的目標顯現為與異性戀主流家庭文化透過語言表達或非語言互動相互適應融合，或是在尚未彼此適應前嘗試以主流文化能夠接受的同化方式（單親家庭）呈現自身的家庭樣貌。受訪者家庭大半在協商過程中同時進行多種共文化溝通策略，以因應不同人事與情境脈絡。

統整研究發現後可知：（1）受訪者的線上家庭認同建構凸顯出本土性別平等風氣的轉變，當同志家長出櫃訊息內容在網路上受公開檢視時，同志家庭身份較少在受訪者熟識的朋友圈中遭污名或攻擊。（2）女同志家庭因家長的性傾向自我肯認歷程不一，及是否進入過異性戀家庭，而產生典型與非典型之分，進而在女同志群體內出現「真假同志家庭」之爭；男同志則可見因血緣論而出現對繼親家長的養父污名。（3）同志家長面對外界提問傾向以對話與教育的策略提供性少數的共文化資訊，可惜有些校方代表或陌生群體拒絕對話並堅持以性別二分或異性戀常規質疑受訪家庭的正當性，往往造成受訪者家庭認同的動搖與裂痕。（4）同婚專法通過後，有效提升同志家庭的法律正當性，也為受訪者賦權，同時帶來鬆動、逐步改革現存異性戀中心體制規範的能動性。（5）以行動展現堅定的非傳統家庭型態，繞過外界負面的回應，協助其看見同志家庭的內涵，逐漸消除原先的偏見和刻板印象。（6）少部分家長遵循主流家庭認同框架，僅揭露較能被接受的單親家庭樣態，漸進式建構自己的家庭認同，續看情境與外界的反應，適度調整揭露的程度。

共文化理論（Orbe, 1998a, 1998b）強調看見主流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的溝通「過程」，該理論能夠指認與定義的協商策略難以窮盡，例如本研究中所見之「改造異性戀家庭常規策略」（transforming heteronormativity），過去並未出現在原先的理論框架或相關研究結果之中。受訪的同志家庭如理論所述確實會檢視主動協商之後的可能損失與回報，作為揭露認同多寡之準則；有些受訪者可能採漸進、階段方式，先經歷自身內在肯認，才能以較堅定自信的信念向外界逐步試探自身家庭樣貌被接受的程度，而外界組織群體亦可能採類似方式循序漸進地接納受訪者之非典型家庭認同。又，本研究中階級與社會位置較高的

受訪者，如醫生與政治工作人員，因具有較高的發聲位置與權力，故較能夠運用其能動性主動協商自身的家庭認同，其中又如受訪者 D 所言，一般人對男同志的偏見與性污名較深重（張德勝、游家盛和王采薇，2013），所以女同志較男同志家庭更願意向外界透露其非傳統家庭認同。

本研究主要探見三類困擾受訪者之同志家庭結構性污名，分述如下。一、「非典型中的非典型」家庭污名：當異性戀以傳統家庭價值框架來挑戰同志家庭的正當性時，出乎意料之外的，女同志家長群組亦用類似「真同志」標準，或「同性戀正典」（homonormativity）來審查曾經進入過異性戀婚姻的女同志家長「夠不夠格」組成「真的」同志家庭；其家庭中的孩子血緣夠不夠「純正」，是否為女同志雙親計劃下所生育，抑或曾在異性戀婚姻下成長。筆者認為家庭認同可被比喻為一道光譜，一端為絕對的異性戀家庭—成員從未進入過其他家庭類型的傳統一男一女核心家庭及其生育的子女，另一端則為絕對的同性戀家庭—成員從未進入過其他家庭類型的同性戀自組家庭與計劃生育的子女。本研究受訪者受污名的經驗揭示，有些女同志社群中的家長將絕對的同性戀視為成為女同性戀家庭的唯一準則，而忽略非典型或同志家庭不會只有一種樣貌，本研究中可見非典型家庭裡存在的多元型態，如：女女自主規劃生育、單女與異婚的子女、女女與異婚的子女、單男與代孕子女、男男與自主規劃生育等不同家庭。位置處於家庭認同光譜中間，在生命階段中遭遇認同變動的家長，其嘗試加入女同志家庭社群的經驗，協助我們思考當家庭認同光譜兩端的家庭將自身的認同強加於其他家庭時，恐怕已形成另一種如同異性戀正典的壓迫與霸權。

二、「養父」污名：如本研究男同志家長所述，因為同婚專法對同志家庭親子關係保障的不足，加上本土父權思想根植於血緣中心論，男同志家庭中與孩子無血緣的家長目前只能以「繼親」家長的身份存在。然而明明家庭是兩位家長共同計劃的，只因為不是提供精子與代孕資金的那一方，法律上遂變成了繼親，與孩子具血緣一方的家族長輩甚至衍生「養父」可能搶走孩子或家產的暗黑想像。此污名恰好違背了本研究多數家長在訪談中所定義的「家」。

家就是兩個相愛的人，一起做的決定。然後一起讓這個家很鞏固，然後一直延續下去。其實我覺得只要有足夠照顧的力量，不一定是兩位家長，那當然就更不侷限家長的性別。所以我覺得就是有足夠力量的大人，可以照顧我們自己的決定，就是一個愛的決定這樣子，那就可以長成我們自己想要的家。（a）

受訪者們心中對家的想像不是成員彼此間是否具有血緣關係，而是個體因為愛，願意一起生活、互相扶持與照顧，支持家中成員成為自己。如果照同志家庭自身的認同來看，法律上的生父與養父之分根本不是重點，應該被看見的是

兩個因為愛而共組家庭的爸爸。比方，之前在無婚姻約束的情況下，與伴侶交往超過 20 年的 T 會向他人介紹：

我們就是一對 gay couple，就是兩個同志爸爸，然後有一個代孕生出來的小朋友。人生當中很多東西都是在一個穩定的感情基礎之下，才有辦法進行或者是才有辦法發生。如果沒有一個穩定的感情基礎，很難想到下一步人生一起組成家庭的發展。（T）

三、「家庭不完整」的汙名：本研究指出，傳統保守的學校或學生家長、甚至受訪者的街坊鄰居，傾向以異性戀核心家庭的常規質疑同志家庭缺乏性別二分的性別親職角色，以「小孩不能沒有爸爸或媽媽」的論述質疑受訪同志家庭的正當性，完全無視國內研究調查結果（王慧琦、徐森杰和伊魯秀一，2017；楊佳蓁，2016）所指陳，同志家庭養育的孩子無異於異性戀家庭成長的孩子。回溯本文一開始對多元家庭的定義，現代多元家庭強調的是不分血緣親疏，以彈性的家庭成員組合，創造人與人間互相照顧的情感與物質生存組合（陳薏如、楊幸珍，2010；彭懷真，2003）。以恐同思想或異性戀霸權來挑釁同志家庭的反同人士經常犯的錯誤是忽視科學證據權威與社會文化變遷，死守異性戀傳統正典，阻礙性少數家庭享有遲來的法律保障與權益，其結果除了製造汙名之外，也造成同志家庭自我懷疑是否為「夠格」家長。

總括而言，本研究發現保障同志婚姻與家庭的法律能有效提高同志家庭的正當性與能動性，有助於同志家庭以堅定自信的溝通互動融入主流家庭文化。筆者建議立法機構針對同志家庭保障的法律增訂應跳脫血緣論與國族限制，本土同志家庭方能更平等地享有異性戀主流家庭群體早已慣有的權益。文化生活實踐上，公私立組織機關亦應跳脫性別二分、結合性別主流化中的多元家庭觀點，儘速更新以異性戀為中心的各式家庭框架與標準，如：媽媽手冊宜修改為寶寶手冊、父母欄更改為家長欄、母親節或父親節亦可廣義地更改為家長節。最後，女同志家長群體需重新檢視圈內文化單一的價值與標準，以避免在不自覺中淪為壓迫多元女同志家庭的雙重霸權。

## 附錄

表 1：共文化的實踐與導向摘要

Examples of practices	Brief description
<b>Nonassertive assimilation</b>	
Emphasizing commonalities	Focusing on human similarities while downplaying or ignoring co-cultural differences
Developing positive face	Assuming a gracious communicator stance where one is more considerate, polite, and attentive to dominant group members
Censoring self	Remaining silent when comments from dominant group members are inappropriate, indirectly insulting, or highly offensive
Averting controversy	Averting communication away from controversial or potentially dangerous subject areas
<b>Assertive assimilation</b>	
Extensive preparation	Engaging in an extensive amount of detailed (mental/concrete) groundwork prior to interactions with dominant group members
Overcompensating	Conscious attempts—consistently enacted in response to a pervasive fear of discrimination—to become a “superstar”
Manipulating stereotypes	Conforming to commonly accepted beliefs about group members as a strategic means to exploit them for personal gain
Bargaining	Striking a covert or overt arrangement with dominant group members where both parties agree to ignore co-cultural differences
<b>Aggressive assimilation</b>	
Dissociating	Making a concerted effort to elude any connection with behaviors typically associated with one’s co-cultural group
Mirroring	Adopting dominant group codes in attempt to make one’s co-cultural identity more (or totally) invisible
Strategic distancing	Avoiding any association with other co-cultural group members in attempts to be perceived as a distinct individual
Ridiculing self	Invoking or participating in discourse, either passively or actively, that is demeaning to co-cultural group members
<b>Nonassertive accommodation</b>	
Increasing visibility	Covertly, yet strategically, maintaining a co-cultural presence within dominant structures

Dispelling stereotypes                      Myths of generalized group characteristics and behaviors are countered through the process of just being one's self

---

**Assertive accommodation**

Communicating self                      Interacting with dominant group members in an authentic, open, and genuine manner; used by those with strong self-concepts

Intragroup networking                      Identifying and working with other co-cultural group members who share common philosophies, convictions, goals

Utilizing liaisons                      Identifying specific dominant group members who can be trusted for support, guidance, and assistance

Educating others                      Taking the role of teacher in co-cultural interactions; enlightening dominant group members of co-cultural norms, values, etc.

---

**Aggressive accommodation**

Confronting                      Using the necessary aggressive methods, including ones that seemingly violate the "rights" of others, to assert one's voice

Gaining advantage                      Inserting references to co-cultural oppression as a means to provoke dominant group reactions and gain advantage

---

**Nonassertive separation**

Avoiding                      Maintaining a distance from dominant group members; refraining from activities and or locations where interaction is likely

Maintaining barriers                      Imposing, through the use of verbal and nonverbal cues, a psychological distance from dominant group members

---

**Assertive separation**

Exemplifying strength                      Promoting the recognition of co-cultural group strengths, past accomplishments, and contributions to society

Embracing stereotypes                      Applying a negotiated reading to dominant group perceptions and merging them into a positive co-cultural self-concept

---

**Aggressive separation**

Attacking                      Inflicting psychological pain through personal attacks on dominant group members' self-concept

Sabotaging others                      Undermining the ability of dominant group members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ir privilege inherent in dominant structures

---

*Notes.* These communicative practices are examples of tactics enacted to promote each orientation.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depending the other personal, interpersonal, or organizational factors, one tactic, (e.g., communicating self) can be used innovatively to promote more than one communication orientation.

資料來源：“Co-Cultural Theorizing: Foundations, Applications & Extensions” by Mark P. Orbe & Tabatha L. Roberts, 2012, *The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23(4), P295-296.



## 參考文獻

- 王晴怡 (2017)。同志家庭的婚權與親權之路。《婦研縱橫》，107，88-93。  
doi:10.6256/FWGS.2017.107.88
- 王增勇 (2011)。跨越世代相遇：看見「老年男同志」。《生命教育研究》，3(1)，169-230。
- 王慧琦、徐森傑、伊魯秀一 (2017)。同志收養的現況與挑戰。《社區發展季刊》，159，291-299。
- 王儷靜 (2017)。性別平等教育教材爭議事件簿。《婦研縱橫》，107，94-107。  
doi:10.6256/FWGS.2017.107.94
- 成令方、吳嘉苓與林鶴玲 (譯)。(1997)。《見樹又見林：社會學作為一種生活、實踐和承諾》(原作者 Allan G. Johnson)。台北：群學出版社出版。
- 朱若蘭 (2003 年 12 月 10 日)。同志催生「反歧視法」。《聯合報》，B5 版。
-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2017)。《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2017 年 12 月 25 日，取自 [https://www.gec.gov.tw/Content\\_List.aspx?n=9751E0ED20DE2DCB](https://www.gec.gov.tw/Content_List.aspx?n=9751E0ED20DE2DCB)
- 何思瑩 (2014)。「非法」情境下的酷兒生殖－台灣女同志的人工生殖科技實作。《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35，53-122。  
doi:10.6255/JWGS.2014.35.53
- 余秋恩、陳逸伶、莊蕙綺、藍貝芝、簡舒培 (2007)。《女同志健康行為調查報告》。台北：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 吳少喬 (2021)。不被學校看見的同志家庭。《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2，36-38。
- 吳蕙如 (2012)。《當我們「同」在一家：五個女人共組家庭與親職教育實踐筆記》。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瓊洳 (2012)。國中社會學習領域公民課程內容之意識型態分析。《教師專業研究期刊》，4，81-108。doi:10.7054/JPT.201212.0081
- 呂欣潔 (2018)。婚姻平權運動的社工視野與運動策略。《東吳社會工作學報》，34，31-41。
- 李佩雯 (2018)。當「他們」也是「我們」：已出櫃同志與原生家庭之跨群體溝通關係維繫研究。《傳播研究與實踐》，8(1)，65-101。  
doi:10.6123/JCRP.2018.003
- 李慈穎 (2007)。《以加之實，抗家之名：台灣女同志的成家實踐》。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DOI: 10.6342/NTU.2007.02904
- 林芝宇 (2017)。多元家庭的教與學。《性別平等教育季刊》，78，131-135。
- 林慧文、游美惠 (2010)。小學中年級國語教科書中的家庭。《課程與教學》，13(2)，47-76。
- 洪于珊 (2012)。《是拉子也是媽媽～拉媽懷孕／生養歷程及困境因應之敘說研究》。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論文。

- 胡郁盈（2017）。從「現身」到「關係」：台灣性別社會變遷與女同志親子協商。《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40，107-151。  
doi:10.6255/JWGS.2017.40.107
- 唐士哲（2004）。民族誌學應用於網路研究的契機、問題與挑戰。《資訊社會研究》，6，59-90。
- 孫子靖、陳振豪（2019）。邁向多元開放的教育環境：臺美同志家庭經驗之我見。《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7，127-129。
- 張可婷（譯）（2010）。民族誌與觀察研究法（原作者: Michael Angrosino）。新北市：韋伯文化。
- 張婉柔（2012）。多元家庭之我見我思。《家庭教育雙月刊》，40，34-43。  
doi:10.6422/JFEB.201211.0034
- 張德勝、游家盛、王采薇（2013）。大學生對男同志和女同志人際關係態度之調查研究。《教育心理學報》，44(S)，411-431。doi:10.6251/BEP.20110524
- 郭曉蓁、游美惠（2013）。聽障女同志的家庭成長經驗與學習處境探究。《性別平等教育季刊》，62，21-38。
- 陳嘉好、余振民（2021）。同志家庭收養經驗之探討。《諮商與輔導》，425，33-38。
- 陳慧如、楊幸真（2010）。初探女同志家庭親屬工作之運作。《台灣性學學刊》，16（2），43-60。
- 彭懷真（2003）。《婚姻與家庭（增訂版）》。高雄：巨流圖書。
- 曾熾融（2013）。女同志家庭親職實作。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doi:10.6342/NTU.2013.00208
- 曾熾融（2019）。女同志家庭的親職照顧。《婦研縱橫》，110，48-59。  
doi:10.6256/FWGS.201904\_(110).07
- 黃書祥（2007）。《國小社會教科書家庭概念之批判論述分析—以 K 版第一冊第一單元為例》。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 黃靖雯（2011）。年過半百做自己：三位中老年女同志的婚姻經驗與情慾實踐。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doi:10.6342/NTU.2011.02608
- 楊佳蓁（2016）。同志家庭對孩子的成長有負面影響嗎？從科學研究角度看 5 個常見問題。上網日期：2021 年 6 月 20 日。  
<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homofamily-children>
- 楊婉瑩（2020）。當不穩定的多數遇到公投—試論同婚公投的弔詭。《臺灣民主季刊》，17(4)，105-144。
- 葉瑜娟（2016 年 5 月 6 日）。同志伴侶：其實我們都一樣。《報導者》。取自  
<https://www.twreporter.org/a/homofamily-equal-rights>
- 趙彥寧（2008）。往生送死、親屬倫理與同志友誼：老 T 搬家續探。《文化研究》，6，153-194。
- 劉安真（2017）。同志伴侶關係與諮商。《輔導與諮商學報》，39(1)，19-38。

- 潘琴葳 (2016)。同志家庭與原生家庭互動關係初探。《輔導季刊》，52(2)，22-34。
-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2012)。《社會政策福利綱領》。取自 <https://www.sfaa.gov.tw/SFAA/Pages/Detail.aspx?nodeid=264&pid=1991>
- 鄭美里 (1997)。《女兒圈：台灣女同志的性別、家庭與圈內生活》。台北：女書文化。
- 鄭詩穎、余漢儀 (2014)。順從有時，抵抗有時：東南亞新移民女性家庭照顧經驗中的拉鋸與選擇。《臺大社會工作學刊》，29，149-197。  
doi:10.6171/ntuswr2014.29.04
- 蕭昭君 (2007)。那妳這樣就不叫一個家庭啊！「多元文化家庭」的教學如何可能？高雄師範大學主編，2007「家庭與工作：變遷現象與多元想像」研討會論文集。
- 謝文宜 (2006)。為什麼結婚：國內將婚伴侶婚姻承諾考量因素之探討。《中華輔導學報》，20，51-82。doi:10.7082/CARGC.200609.0051
- 謝文宜、曾秀雲 (2015)。臺灣同志伴侶的家庭圖像。《臺大社會工作學刊》，31，1-54。doi:10.6171/ntuswr2015.31.01
- Acosta, K. L. (2011). The language of (in)visibility: Using in-between spaces as a vehicle for empowerment in the family.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58(6-7): 883-900.
- Allen, K. R., & Walker, A. J. (2000).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C. Hendrick, & S. S. Hendrick (Eds.), *Close relationships: A sourcebook* (pp. 19-30). Thousand Oaks, CA: Sage.
- Baker, B. M. A. (2019). "We're Just Family, You Know?" Exploring the Discourses of Family in Gay Parents' Relational Talk. *Journal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19(3), 213-227. <https://doi-org.rpa.shu.edu.tw/10.1080/15267431.2019.1590365>
- Bashir, H. (2009). Theory of co-culture and co-cultural groups: Study of Muslims communications in the USA. *Iranian Journal of Cultural Research*, 2, 97 - 123.
- Bie, B., & Tang, L. (2016). Chinese gay men's coming out narratives: Connecting social relationship to co-cultural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9(4), 351-367. <https://doi-org.rpa.shu.edu.tw/10.1080/17513057.2016.1142602>
- Brainer, A. (2021). Lesbian and gay parents, heterosexual kinship, and queer dreams: Making families in twenty-first century Taiwan. *Positions Asia Critique*, 29(3), 633-656.
- Breshears, D. & Beer, C. (2014)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adult children's advice for parents coming out to their children.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45(4): 231-238. doi: 10.1037/a0035520

- Breshears, D. (2010). Coming Out with Our Children: Turning Points Facilitating Lesbian Parent Discourse with Their Children About Family Identity. *Communication Reports*, 23(2), 79–90. <https://doi-org.rpa.shu.edu.tw/10.1080/08934215.2010.511398>
- Breshears, D., & DiVerniero, R. (2015). Communication privacy management among adult children with lesbian and gay parents. *Wester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79, 573–590. doi:10.1080/10570314.2015.1070195
- Camara, S.K., Katznelson, A., Hildebrandt-Sterling, J., & Parker, T. (2012). Heterosexism in context: Qualitative interaction effects of co-cultural responses.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23(4), 312–331. doi:10.1080/10646175.2012.722836
- Chen, Y.-R., & Wang, P. (2010). Obstacles to LGBT human rights development in Taiwan. *Positions*, 18(2), 399-407.
- Chevrette, R. (2013). Outing heteronormativity in interpersonal and family communication: Feminist applications of queer theory ‘‘beyond the sexy streets.’’ *Communication Theory*, 23, 170–190. doi:10.1111=comt.12009
- Decena, C. (2008). Tacit subjects.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14(2-3): 339-359.
- Dempsey, D. (2013). Surrogacy, gay male couple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biogenetic paternity. *New Genetics & Society*, 32(1), 37–53. <https://doi-org.rpa.shu.edu.tw/10.1080/14636778.2012.735859>
-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1994). Introduction: Entering the field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K. Denzin and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17).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 Dixon, J., & Dougherty, D. S. (2014). A language convergence/meaning divergence analysis: Exploring how LGBTQ and single employees manage traditional family expectations in the workplace.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2, 1-19.
- Elia, J. P. (2003). Queering relationships: Toward a paradigmatic shift.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45, 61–86. doi:10.1300=J082v45n02\_03
- Friedman, S. & Chen, Y.-C. (2021). Will marriage rights bring family equality? Law, lesbian co-mothers, and strategies of recognition in Taiwan. *Positions*, 29(3), 551-579.
- Galvin, K. M. (2006). Diversity's impact on defining the family: Discourse-dependence and identity. In L. H. Turner & R. West (Eds.), *The family communication sourcebook* (pp. 3-20)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Gates, G. J. (2015). Marriage and family: LGBT individuals and same-sex couples. *The Future of Children*, 25, 67–87.

- Giammattei, S. V., & Green, R.J. (2012). LGBTQ couple and family therapy: History & future directions. In J. Bigner & J. Wetchler (Eds.), *Handbook of LGBT-affirmative couple and family therapy* (pp. 1–22). New York, NY: Taylor & Francis.
- Gianino, M., Goldberg, A., & Lewis, T. (2009). Family outings: Disclosure practices among adopted youth with gay and lesbian parents. *Adoption Quarterly, 12*, 205–228. doi 10.1080/10926750903313344
- Goldberg, A. E. (2007). Talking about family: Disclosure practices of adults raised by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parent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8*, 100–131. doi:10.1177/0192513X06293606
- Goldberg, A. E. (2010). *Lesbian and gay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Research on the family life cycle*.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Goldberg, Abbie E. and Julianna Z. Smith (2011) Stigma, social context, and mental health: Lesbian and gay couples across the transition to adoptive parenthood.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8*(1): 139-150. doi: 10.1037/a0021684
- Haines, K. M., Boyer, C. R., Giovanazzi, C., & Galupo, M. P. (2018). “Not a Real Family”: Microaggressions Directed toward LGBTQ Familie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65*(9), 1138–1151. <https://doi-org.rpa.shu.edu.tw/10.1080/00918369.2017.1406217>
- Harter, L. M., Edwards, A., McClanahan, A., Hopson, M., & Carson-Stern, E. (2003). *Exploring street journals from a co-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case of Street Wi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Miami, FL.
- Hopson, M. C., & Orbe, M. (2007). Playing the game: Recalling dialectical tensions for Black men in oppressiv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8*, 69-86.
- Huisman, D. M. (2014). Telling a family culture: Storytelling, family identity, and cultural membership. *Interpersona, 8*, 144-158.
- Jhang, J. (2018). Scaffolding in Family Relationships: A Grounded Theory of Coming Out to Family. *Family Relations, 67*(1), 161–175. <https://doi-org.rpa.shu.edu.tw/10.1111/fare.12302>
- Kam, L. (2013). *Shanghai lalas: Female tongzhi communities and politics in urban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Kelly, F. (2011). *Transforming law’s family: The legal recognition of planned lesbian motherhood*.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 Kuvalanka, K. A., Goldberg, A. E., & Oswald, R. F. (2013). Incorporating LGBTQ issues into family courses: Instructor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relative to perceived teaching climate. *Family Relations, 62*, 699–713

- Kuvalanka, K., Leslie, L., & Radina, R. (2014). Coping with sexual stigma: Emerging adults with lesbian parents reflect on the impact of heterosexism and homophobia during their adolescence.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29*(2), 241-270. DOI: 10.1177/0743558413484354
- Lannutti, P. J. (2014). Families centered upon a same-sex relationship: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in the context of legally recognized same-sex marriage. In L. A. Baxter (Ed.), *Remaking "family" communicatively* (pp. 51–68).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Lannutti, P. J. (2018). Committed, Unmarried Same-Sex Couples and their Social Network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hips and Discursive Strategie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65*(9), 1232–1248. <https://doi-org.rpa.shu.edu.tw/10.1080/00918369.2017.1411690>
- Lee, P.-W. (2006). Teaching as a co-cultural instructor in a diverse classroom. *Transit: The LaGuardia Journal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1*, 25-28.
- Liu, J.-P., & Ding, N. (2005). Reticent poetics, queer politic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6*(1): 30-55.
- Moreira, L. (2019). Living lesbian relationships in Madrid: Queering life and families in times of straight living fossils. In M. W. Yarbrough, A. Jones, & J. N. DeFilippis (Eds.), *Queer families and relationships after marriage equality* (pp. 17-30). New York: Routledge.
- Orbe, M. (1998b). From the standpoint(s) of traditionally muted groups: Explicating a co-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model. *Communication Theory, 8*, 1-26.
- Orbe, M. P. (1998a). *Constructing co-cultural theory: An explication of culture, power, and communica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 Orbe, M. P., & Roberts, T. L. (2012). Co-cultural theorizing: Foundations, applications & extensions.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23*(4), 293-311. doi:10.1080/10646175.2012.722838
- Oswald, R., Blume, L. B., & Marks, S. (2005). Decentering heteronormativity: A model for family studies. In V. L. Bengtson, A. C. Acock, K. R. Allen, P. Dilworth-Anderson, & D. M. Klein (Eds.), *Sourcebook of family theory & research* (pp. 143–165). Thousand Oaks, CA: Sage.
- Ramirez-Sanchez, R. (2008). Marginalization from within: Expanding co-cultural theory through the experience of *Afro Punk*.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19*, 89–104.
- Robinson, M. A. & Brewster, M. E. (2014). Motivations for fatherhood: Examining internalized heterosexism and gender-role conflict with childless gay and bisexual men. *Psychology of Men & Masculinity, 15*(1): 49-59.

- Rostosky, S. S., & Riggle, E. D. (2017). Same-sex relationships and minority stress.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13*, 29-38.
- Shieh, W.-Y. (2010). Gay and lesbian couple relationship commitment in Taiwan: A preliminary study.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57*, 1334–1354.  
doi:10.1080/00918369.2010.517078
- Sue, D. W., Capodilupo, C. M., Torino, G. C., Bucceri, J. M., Holder, A. M., Nadal, K. L., & Esquilin, M. (2007). Racial microaggressions in everyday life: Implications for clinical practi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62*, 271–286.  
doi:10.1037/0003-066X.62.4.271
- Walton, G. (2005). The hidden curriculum in schools: Implications for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and queer youth. *Alternate Routes, 21*, 18–39.
- Yau, C. (2010). Dreaming of normal while sleeping with impossible: Introduction. In C. Yau (Ed.), *As normal as possible: Negotiating sexuality and gender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pp. 1-14).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Yep, G. A. (2002). From homophobia and heterosexism to heteronormativity: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 model of queer interventions in the university classroom. *Journal of Lesbian Studies, 6*(3/4), 163-176.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2020 年 8 月 4 日

計畫編號	MOST107-2629-H-128 -001 -MY2		
計畫名稱	「不夠格家庭？」：台灣同志家庭與子女教育現場之共文化溝通研究		
出國人員姓名	李佩雯	服務機構及職稱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系 副教授
出國時間	2019 年 7 月 12 日至 2019 年 7 月 15 日	出國地點	捷克布爾諾 Masaryk University, Brno, Czech Republic
出國研究目的	<input type="checkbox"/> 實驗 <input type="checkbox"/> 田野調查 <input type="checkbox"/> 採集樣本 <input type="checkbox"/> 國際合作研究 <input type="checkbox"/> 使用國外研究設施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蒐集資料		

一、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計畫主持人原準備 2019 年七月前往馬德里 IAMCR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傳播年會發表論文，結果因為該年投稿量大增 (3700 多件)，研究者的投稿並未被接受，甚至連單純報名參加的名額都被爭先搶報一空 (南歐向來是研討會參與者暴增的地點)。經與本校研發處同仁討論之後，主持人決定更改差旅計畫，先於 2019 年使用移地研究經費，以免 2020 年必須在一年內參加兩個國外研討會，外加一個移地研究，屆時負擔將過度繁重。研究者遂在 7/12-15, 2019 至捷克布爾諾 (Brno) 參加 IAIC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跨文化傳播研討會作為該兩年期計畫之中的移地研究行程。

二、研究成果 (摘要)

該研討會為 IAICS 第 25 屆年會，主題為 East/West: New Divisions, New Connections in a Populist Political Reality, 主要探討的研究子題如下：(摘自研討會 call for papers)

1. How do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on scholars understand the shifting discourses around the “West” and its “Others”?
2. How have – fictional and non-fictional – representat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est” and “Others” evolved?



3. How have the center and the periphery been re-defined, re-imagined and re-negotiated?
4. What is 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building connections/divisions in the current climate?
5. How have major policy interventions – such as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 affected intercultural divisions/connections?
6. How relevant are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cultural integration developed in Western liberal democracies for understanding current developments?
7. What are the most challenging issues that scholar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face at the moment?
8. Are there historical lessons that can inform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上述的子題企圖引起跨文化傳播學者們針對現今民粹主義在美國及歐洲所激起的一連串社會文化與跨文化政治傳播現象進行討論。各國分裂的移民政策和政治論述造成眾多與種族相關的犯罪，激烈的種族歧視態度也再次升高。從美國、英國到匈牙利，越來越多地區的人們無法包容族群（種族）之間的差異。特別的是，2019 年是柏林圍牆倒塌 30 週年，許多本是蘇聯集團的歐洲國家現在紛紛加入歐盟與北約，但是目前新的東方（East）成員國（或其他 others）和舊的西方成員國之間不斷出現緊張關係，例如：2015 年出現的全球難民危機、脫歐。不只是俄羅斯與歐盟之間的關係降到最低點，中美之間的貿易戰也間接影響了全球化下的貿易產業鍊。跨文化傳播界的學者關注的是人們在此時空背景下，民粹主義如何在世界各國影響其言論自由以及審查制度，例如在埃及、俄羅斯、和土耳其等國家。

於此研討會的主題框架之下，主持人對社群媒體時代下的種族歧視論述與傳播方式相當感興趣，因此在三天的研討會期間，參與了許多相關主題的論壇，探討了包括荷蘭的 anti-jew 運動、挪威的 white genocide，以及近幾年在許多國家頻頻出現的 xenophobia, islamophobia, anti-immigration, antisemitic 等現象。其中，政治修辭學者 George Lakeoff 的主張被此次研討會的研究者多次提及，尤其是他的重要著作：“The ALL NEW Don’t Think of an Elephant”。George Lakeoff 有「框架、議題設定之父」（father of framing）的稱號，他認為議題設定與「想法」（ideas）有關，想法先於政策，可用來理解事實，而且這個想法必須每天都在公眾的生活中被大肆宣

揚溝通。Lakeoff的這本書“The ALL NEW Don’t Think of an Elephant”重新探究了議題設定該怎麼運作、過去幾年有關議題設定的策略是怎樣演變的？人們應該如何因應具備不同世界觀的他人，包括保守與進步派？如何反制對方陣營所釋出的說服性宣傳和口號。Lakeoff提到兩個重要的政治說服模組：strict father model vs. nurturant parent model，同時他強調人們通常傾向投票給他們自身的認同，而不是政治人物提供的數據（People vote for their identities rather than facts!），嘲笑自己的政治對手對於說服溝通來說是沒有用的。

這些有關民粹主義造成的歧視性言論攀升與議題設定討論，令主持人思考到一個類似的命題：為何在台灣政治不正確的性別言論可以肆無忌憚地一再出現（例如：針對蔡英文的諸多不當批評—穿裙子的無法擔任三軍統帥）？為什麼只要一選舉，台灣就會出現公開厭女的言論？但這些厭女言論在新聞中被報導之後好像也不會對這些政治人物（例如：柯文哲、韓國瑜）產生任何後果，大家似乎很快就淡忘了？難道是因為沒有造成任何可量化的傷害，所以就無妨？但是網路上厭女的言論（參閱 manosphere studies）恐怕早已造成台灣性別文化上的重大缺口。換言之，主持人思索的問題是：厭女文化是否為全球右翼言論與思想再度崛起後，在台灣的具體展現？

### 三、建議

無。未來計畫主持人在投稿研討會時宜同時投兩個研討會，提高錄取的可能，以避免被一個研討會拒絕時，出國差旅發表的計劃受阻。

### 四、本次出國若屬國際合作研究，雙方合作性質係屬：(可複選)

- 分工收集研究資料
- 交換分析實驗或調查結果
- 共同執行理論建立模式並驗證
- 共同執行歸納與比較分析
- 元件或產品分工研發
- 其他 (請填寫) \_\_\_\_\_

### 五、其他

〈出訪後心得〉

再看一次電影「名畫的控訴」(Woman in Gold)，一切都串起來了。關於「歸還」(restitution)。關於這次移地研究旅行。

謝謝成功大學李佳玟老師的提醒，讓我想要重看幾年前在飛機上昏昏欲睡下瞄過的真人真事改編名畫訴訟案件翻拍電影。當時，沒有留下太深刻的印象。

這次，我剛從維也納歸來，總覺得對這個城市有一種說不上來，不怎麼歡喜的感覺。有被虧待嗎，倒是沒有。但是去了那些滿是觀光客的名勝，景緻確實怡人，可卻好像說不出自己究竟從中 *make sense* 了什麼。

還好，這部電影幫了我。

Klimt 的這幅畫「Adele 肖像一號」在二戰期間被納粹掠奪，之後大戰結束，歷經數十年，一直歸奧地利所有，擺放在 *Belvedere Museum* 展示。而這部電影正是在講述這幅畫如何費時六年，*against all odds*，從納粹不義取得的管道留給了政府之後，又從奧地利人手中合法歸還給 Adele 逃難到美國定居的甥女 Mrs. Altmann 的故事。現在這幅畫不在奧地利，而是高價賣給紐約的新藝廊，因為當年奧地利政府一開始不願意跟 Altmann 協商，把她老人家惹毛了。

還沒完。

看電影途中，我聽到 Mrs. Altmann 說出關鍵字歸還，突然想起我在布爾諾研討會期間參加的 *guided tour - UNESCO heritage* 圖根哈特別墅。這個蓋在 1930 年代的現代式建築，真的很神奇，裡面居然有中央空調、洗衣機等現代化生活電器和室內設計。可也因為二戰，圖根哈特一家只在裡頭住了八年，就逃到瑞士了。可以想像，這特別的白色大宅曾被納粹佔領、毀壞，戰後「歸」捷克政府所有。網路上的記載說，多年前圖根哈特太太和其後族想取回原屬於他們的房子所有權，結果被捷克政府拒絕，說是布爾諾市已經花費太多錢整修這房子，不可能還給圖根哈特家了。

然後，還沒完。

如果說可以歸還的物質都討不回，那麼那些歸還不起的呢？人們能夠去跟誰要？我去布爾諾是為了參加今年的 IAICS 研討會。第一天的第一場 *keynote speaker*，一位白頭髮老公公歷史學者在大家時差到不能自己的情況下，講到一直哭，害大家都醒來。說真的，非常感人。他講的就是二戰時許多原本居住在捷克的無辜德國人後來被趕出捷克（因為被迫害的人太氣了），有家卻「歸」不得。後來這群德國人因為回不了家，因此在世界各地組成 *community*（有點像同鄉會的概念），以那些 *community* 為家。

三個轉折串起來，這世界的轉型正義，永遠做不完。多少人因為某些人類的錯誤，再也不要不回原先屬於他們的珍貴人事物，像是 **Altmann** 的父母，像是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圖根哈特別墅，像是這些德國人在捷克的家。

唉，戰爭的代價太大。歸還好像是理所當然，卻又那麼難。

（記于 2019 夏，IAICS 布爾諾研討會之後）

#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9 年 8 月 6 日

計畫編號	MOST 107-2629-H-128 -001 -MY2		
計畫名稱	「不夠格家庭？」：台灣同志家庭與子女教育現場之共文化溝通研究		
出國人員姓名	李佩雯	服務機構及職稱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系
會議時間	2020 年 5 月 20 日至 2020 年 5 月 27 日	會議地點	澳洲黃金海岸，因疫情改為線上會議
會議名稱	The 70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onference, Open Communication, Virtual Conference, 20-27 May 2020		
發表題目	“Unqualified families?”: The co-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of same-sex families coping with the external social links in Taiwan		

## 一、參加會議經過

此次 ICA70 週年年會因為新冠肺炎疫情改為線上進行，也讓我有第一次參與線上國際研討會的機會。大會規定，所有參與者在會議開始之前先預錄自己的口頭報告影片，上傳至線上研討會的網站。研討會日期開始時，所有參與者得以在任何時間觀看所有的論壇報告影片，除非是少數直播的論壇則有時間的限制（因為時差），不過直播結束後，仍然可以回到網站上自行觀看。

## 二、與會心得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十分新穎的經驗，好處是我可以自己安排時間，挑選觀看更多口頭發表的影片；缺點是影片錄製的品質不一，有些音質不好，有些無法觀看發表人的非語言表情，因此接收到的資訊參差不齊。另一個不知是好還是壞的全新經驗是，因為想看的影片報告實在太多了，所以這是我第一次真的可以把所有感興趣的影片（報告）都看一遍（很累其實！），並且可以快轉跟自己的研究比較不相關的報告，直接進入自己有興趣的主題。真是所謂的數位時代啊！

在一週的線上研討會開放過程中，我一共瀏覽了五個不同 divisions 的數個論壇：(1) LGBT, (2) Feminist Scholarship, (3)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4)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5)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初步歸納，LGBT division 底下的論文主要在探討 digital communication, dating applications online, 我自己的論文也是投稿到此組，很感謝有一名研究者觀看我的報告後，建議我使用酷兒研究中近年來很火紅的理論 “Queer Asia as Method”。Feminist Scholarship division 所發表的論文多數探討 #MeToo, 韓國的女性處境 (Korean Entertainment Industry)。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divisions 仍然保持其非常量化的傳統，研究主題涵蓋：線上關係、dating app as a game (比較男性女性如何在群體中討論自己使用的線上交友)。

此次研討會的主題：Open Communication 帶給我很大的啟發。我觀看了一個討論該主題的論壇 “An Agenda for Open Science in Communication”，參與的各國學者引用了 Dienlin et al. 也簡述了下列主軸：(1) publish materials, data, and code, (2) preregister studies and submit registered reports, (3) conduct replication studies, (4) collaborate, (5) foster open science skills, (6) implement transparency and openness promotion guidelines, and (7) incentivize open science practices. 簡言之，該主題為目前全世界的重要研究潮流，強調研究過程的透明性、多方開拓性的合作，及創造更大的公共利益，這樣的觀念在西方已經應用在許多學術專業中，重點在分享學術資源、提早釋出研究想法、更細緻地去合作分析研究材料，以協助未來的學者能產出品質更好的學術貢獻。然而世界各國對於 Open Communication 的實踐程度可能還相當不一致，因此此次研討會鼓勵全世界的傳播學者來分享這個概念在其他國家的實際作法。在台灣，科技部也非常鼓勵我們進行跨領域的合作，但是我衷心希望本土能有更多管道，包含校方和系所都能容許不同領域的學者們一起發表、互相討論尚未發展成熟的研究想法，互相給意見，讓研究方法更完整、適切，分析更為縝密富有深度，進而得出品質更好的研究結果。這個取徑強調的不只是出版結果，更多的是「研究過程」！

(For more information check #opencomm #openica on youtube)

###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 **"Unqualified families?": The co-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of same-sex families coping with the external social links in Taiwan<sup>1</sup>**

---

<sup>1</sup> The current research is funded by a two-year (2018-2020) grant provided by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in Taiwan.

## WORK IN PROGRESS

### *Background*

On May 24, 2017, Taiwan's grand judge made a declaration that the civil law discriminates against the gay community, violating “freedom of marriage” listed in the constitution. Two years later, on May 24, 2019, Taiwan has become the first country in Asia legalizing same-sex marriage and allowing legal adoption for the gay partner’s biological child. According to *Taiwan LGBT Family Rights Advocacy*, currently there are more than 100 families formed by same-sex couples, with more than 200 children who could be adopted, artificially reproduced, or born by the gay individuals in the previous heterosexual marriages.

Previous research on gay community in Taiwan focuses mainly on gay individuals’ personal level of adaptation to the mainstream culture (e.g., the formation of homosexual identity, or the coming out strategies to their original families), very little research has looked at the social interaction between same-sex couples and the external society (e.g., schools, workplaces, medical systems, public institutions, living community). Although recently Taiwanese people are becoming more likely to support same-sex marriage, the social view is rather divided regarding whether same-sex couples could have their own children and form their families.

As the scholars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indicate, family identity is constructed through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mmunication (Galvin, 2006). In addition to communicating with family members to maintain intimate family relationship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amily members and the external society also deeply aff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family identity. Family identity is not only an internal relationship process, it is also an interactive process co-created by family members and the external social systems (Huisman, 2014).

Hence, the researcher intends to adopt Mark Orbe’s (1998a, 1998b) Co-Cultural Theory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further explore how same-sex couples with children form their family identity by interacting and negotiating with the society as a whole. Specifically, the researcher aims to employ in-depth qualitative interviews (at least 3 times with each family) with 8 recruited gay and lesbian families within two years of time, in order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how do the parents of same-sex families negotiate their nontraditional family identity with individuals and professionals in the external social settings? Throughout the process, what are the co-cultural orientations and strategies used by the same-sex parents? And finally, how do the individuals and professionals in the social settings respond to the same-sex parents’ co-cultural communication?**

##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Theory*

### 1. Studies on gay families under the heterosexual mainstream culture

Rostosky & Riggle (2017) suggest that when discussing the pressures of minorities faced by gays, researchers should not focus solely on issue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but also on influences from people-to-people, institutional (schools, work organizations, churches), cultures (laws, policies, and heterosexual norms), and other different structural levels. Studies concerning lesbian families in Taiwan point out that the ideology of advocating heterosexuality makes it difficult for gay families to develop their diverse family imaginations, and many times, in order to get rid of social stigma, gay families must strive to emulate the appearance of heterosexual famili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so-called standards of “normal and adequate” families.

### 2. Western studie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ay families and the external social links

Previous western literature states that it is not just same-sex parents who have to face their sexuality, but the rest of the family members, such as children who have to think carefully about whether to expose their family identity to the outside world (Breshears & DiVerniero, 2015). Kivalanka, Leslie, & Radina (2014) found that children of gay families are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who often feel excluded from many activities in school. In fact, whether in schools or workplaces, individuals from gay or other atypical families, often feel that they have no way to talk about their family identities, and they find themselves compelled to move away from the daily conversations and meaning constructions (Dixon & Dougherty, 2014).

### 3. Theory: Mark Orbe's Co-Cultural Theory

The researcher argues that it is still challenging for gay families in Taiwan to disclose or communicate about their family identity with the external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nd Mark Orbe's "co-cultural theory" (1998a) fits to help us explore and understand this communication process between two group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power in the society. According to Orbe (1998a), co-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fers to the process of negotiat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members of minority, nondominant groups (or co-cultural groups) and dominant groups. This theory emphasizes how members of these co-cultural groups employ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to interact with members of the dominant cultural groups. The focus is not on defining these different practices and behaviors, but on recogniz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co-cultural groups and dominant groups, and the unequal situations the members of co-cultural groups have to face on daily basis (Table 1).



Previous research adopting co-cultural theory as a research framework often examines the unequal context of a minority group within a particular dominant culture, such as the Muslim commu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Bashir, 2009), African-Americans in the white based organizations, (Hopson & Orbe, 2007), and an Asian female professor in a white based university (Lee, 2006). Specifically, Camara, Katznelson, Hilderbrandt-Sterling, & Parker (2012) studied communication responses and strategies employed by gay and lesbian groups facing sexual orientation discrimination in American society and emphasized that the most vulnerable situation for LGBT groups is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the public and strangers.

**Table 1: The orientations and practices of co-cultural groups**

Examples of practices	Brief description
<b>Nonassertive assimilation</b> Emphasizing commonalities	Focusing on human similarities while downplaying or ignoring co-cultural differences
Developing positive face	Assuming a gracious communicator stance where one is more considerate, polite, and attentive to dominant group members
Censoring self	Remaining silent when comments from dominant group members are inappropriate, indirectly insulting, or highly offensive
Averting controversy	Averting communication away from controversial or potentially dangerous subject areas
<b>Assertive assimilation</b> Extensive preparation	Engaging in an extensive amount of detailed (mental/concrete) groundwork prior to interactions with dominant group members
Overcompensating	Conscious attempts—consistently enacted in response to a pervasive fear of discrimination—to become a “superstar”
Manipulating stereotypes	Conforming to commonly accepted beliefs about group members as a strategic means to exploit them for personal gain
Bargaining	Striking a covert or overt arrangement with dominant group members where both parties agree to ignore co-cultural differences
<b>Aggressive assimilation</b> Dissociating	Making a concerted effort to elude any connection with behaviors typically associated with one’s co-cultural group

Mirroring	Adopting dominant group codes in attempt to make one's co-cultural identity more (or totally) invisible
Strategic distancing	Avoiding any association with other co-cultural group members in attempts to be perceived as a distinct individual
Ridiculing self	Invoking or participating in discourse, either passively or actively, that is demeaning to co-cultural group members
<hr/>	
<b>Nonassertive accommodation</b> Increasing visibility	Covertly, yet strategically, maintaining a co-cultural presence within dominant structures
Dispelling stereotypes	Myths of generalized group characteristics and behaviors are countered through the process of just being one's self
<hr/>	
<b>Assertive accommodation</b> Communicating self	Interacting with dominant group members in an authentic, open, and genuine manner; used by those with strong self-concepts
Intragroup networking	Identifying and working with other co-cultural group members who share common philosophies, convictions, goals
Utilizing liaisons	Identifying specific dominant group members who can be trusted for support, guidance, and assistance
Educating others	Taking the role of teacher in co-cultural interactions; enlightening dominant group members of co-cultural norms, values, etc.
<hr/>	
<b>Aggressive accommodation</b> Confronting	
Gaining advantage	Inserting references to co-cultural oppression as a means to provoke dominant group reactions and gain advantage
<hr/>	
<b>Nonassertive separation</b> Avoiding	Maintaining a distance from dominant group members; refraining from activities and/or locations where interaction is likely
Maintaining barriers	Imposing, through the use of verbal and nonverbal cues, a psychological distance from dominant group members
<hr/>	

<b>Assertive separation</b> Exemplifying strength	Promoting the recognition of co-cultural group strengths, past accomplishments, and contributions to society
Embracing stereotypes	Applying a negotiated reading to dominant group perceptions and merging them into a positive co-cultural self-concept
<b>Aggressive separation</b> Attacking	Inflicting psychological pain through personal attacks on dominant group members' self-concept
Sabotaging others	Undermining the ability of dominant group members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ir privilege inherent in dominant structures

*Notes.* These communicative practices are examples of tactics enacted to promote each orientation.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depending the other personal, interpersonal, or organizational factors, one tactic, (e.g., communicating self) can be used innovatively to promote more than one communication orientation. Source: "Co-Cultural Theorizing: Foundations, Applications & Extensions" by Mark P. Orbe & Tabatha L. Roberts, 2012, *The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23(4), P295-296.

### **Method**

The researcher is currently a board member and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Awakening Foundation, Taiwan's oldest NGO advocating for women's rights, which allows the researcher to maintain friendly connections with LGBT NGOs in Taiwan. To recruit participants for this two-year study, the researcher used the snowballing technique and asked LGBT NGOs, such as *Taiwan LGBT Family Rights Advocacy* and *Taiwan Tongzhi Hotline Association*, to spread the research advertisement on their internal social media group pages. Fortunately, there are 8 gay and lesbian families (Table 2) living in Taipei, Taichung, Hsinchu, Tainan, and Yilang (north, mid, south, and east of Taiwan) who agree to participate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The research team has completed two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each family, including one life history interview over the phone and one face to face interview at the participant's choice of local neighborhood café.

**Table 2: Descriptions of Participants**

Family	Sexual Orientation & Family status	City	Profession	Children
Yo	lesbian/dating	Tainan	diviner	one boy 4 years old from previous heterosexual marriage

Am	lesbian/married	Yilang	restaurant owner	one boy 3.3 years old, one girl 10 months, artificial reproduction
Ya	lesbian/married	Tainan	doctor	3.5 years old, 1.3 years old both are girls
Ch	gay/single	Taipei	doctor	one boy 4 years old
Ho	lesbian/dating	Taichung		one boy (senior high school), one girl (5 <sup>th</sup> grader) both from the previous heterosexual marriage
Ac	lesbian/committed relationship	Hsinchu	Healing professional, book author	two junior high school girls from previous heterosexual marriage
Lu	gay/single	Taipei	finance	one boy 2.5 year old and an expected girl from a surrogated mother in the US
Tx	gay/committed relationship (20 years)	Taipei	dentist	one boy 2 years old from a surrogated mother in the US

1. Life history in-depth interview (Jan-March, 2019): The parents of gay and lesbian families involved in this study shared the stories of coming out to their original families, how they met each other, how they decided to form a family and raise children together. On average, the interview lasted for 30 mins to an hour on the phone.
2. The first semi-structured in-depth face to face interview (April-June, 2019): This round of interview was designed to discuss the participants' daily interactions and experiences with their social links, such as at their children's schools, in their own workplaces, with the local community neighbors, at the medical center, with the public household offices in dealing with their marriage certificate or their children's birth certificate. Each interview on average lasted for 1-2 hours.
3. The upcoming follow-up interview (December 2019-February 2020): The researcher intends to follow up on what happens afterwards regarding some of the scenarios discussed/occurred in the participants daily interactions with their external social links. Thus, the second face to face interview with the gay parents

will help to answer the left questions from the first interview and update with new stories.

### ***Preliminary Findings***

Based on the raw interview data, the researcher will roughly list the preliminary findings gathered from 8 gay and lesbian families in answering the research questions: (1) how do the parents of same-sex families negotiate their nontraditional family identity with individuals and professionals in the external social settings? (2) Throughout the process, what are the co-cultural orientations and strategies used by the same-sex parents? (3) And finally, how do the individuals and professionals in the social settings respond to the same-sex parents' co-cultural communication?

#### **1. RQ1: Negotiating strategies**

- (1) Coming out (revealing about her sexual and family identity) on the social media: For participant Ho, it's easier to "announce the news" on her Facebook, as her daughter's teacher and her coworkers are all her Facebook friends. These individuals from the external social links can all get it from the message she posted online without having to negotiate this issue face to face. Afterwards, Ho started to frequently post intimate pictures of her and her girlfriend on Facebook.
- (2) Bringing the child to the workplace: Ch, Tx, Lu, and Ya's strategy is taking their children to their workplace without further explanations about their private life. They are open for people's guess (about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family identity) but they don't intend to address their coworkers' questions or concerns.
- (3) Only revealing to the public as a single parent: Yo, Ch, Lu all chose to appear as a single parent in their children's schools, so that they don't have to discuss their nontraditional family identity with the school teachers, staff, or other kids' parents.
- (4) Open to the public about their gay family identity: Am and Ac are quite open about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ay family identity. In Am and Li's restaurant, the rainbow flag is placed in a very obvious location, symbolizing their pride to be a gay family. Ac even wrote and published a book, discussing their experiences of raising two high school daughters (from her partner's previous heterosexual family) as a gay family.

#### **2. RQ2: Co-cultural orientations and practices**

- (1) Nonassertive separation (avoiding) and nonassertive accommodation (increasing visibility): These orientations and strategies are close to Ho's practices of coming out on her Facebook and posting photos on it.
- (2) Aggressive assimilation (strategic distancing): This orientation is similar to what the gay fathers and lesbian mother did in only revealing their parent identity so as to appear like or close to everyone else in their children's schools.
- (3) Assertive accommodation (communicating self, educating others): This orientation explains what and how Am and Ac perform in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in the social settings.

### **3. RQ3: Responses from the social links**

- (1) Supportive feedback: Lu's supervisor, Ya's professor (also her colleague in the hospital), Tx's coworkers in the clinic, Am's local household office staffs and customers of their restaurant, and Ac's partners' daughters' classmates are all very positive and encouraging when finding out about their gay family identity, whether they are married, in a long term relationship, or single at the moment.
- (2) Overly protected feedback: After Ho's daughter's teacher found out about their gay family identity, the teacher asked Ho's daughter not to mention it to other classmates. The teacher emphasized that this is "for her own good".
- (3) Negative feedback: Because Ac and Ya are both more masculine and appear like a tomboy, they have encountered terrible name calling in the market and in a political gathering from total strangers when they were with their family or children.

## References

- Allen, K. R., & Walker, A. J. (2000).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C. Hendrick, & S. S. Hendrick (Eds.), *Close relationships: A sourcebook* (pp. 19-30). Thousand Oaks, CA: Sage.
- Bashir, H. (2009). Theory of co-culture and co-cultural groups: Study of Muslims communications in the USA. *Iranian Journal of Cultural Research*, 2, 97–123.
- Breshears, D., & DiVerniero, R. (2015). Communication privacy management among adult children with lesbian and gay parents. *Wester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79, 573–590. doi:10.1080/10570314.2015.1070195
- Camara, S.K., Katznelson, A., Hildebrandt-Sterling, J., & Parker, T. (2012). Heterosexism in context: Qualitative interaction effects of co-cultural responses.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23(4), 312–331. doi:10.1080/10646175.2012.722836
- Chevrette, R. (2013). Outing heteronormativity in interpersonal and family communication: Feminist applications of queer theory “beyond the sexy streets.” *Communication Theory*, 23, 170–190. doi:10.1111=comt.12009
-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1994). Introduction: Entering the field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K. Denzin and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17).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 Dixon, J., & Dougherty, D. S. (2014). A language convergence/meaning divergence analysis: Exploring how LGBTQ and single employees manage traditional family expectations in the workplace.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2, 1-19.
- Elia, J. P. (2003). Queering relationships: Toward a paradigmatic shift.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45, 61–86. doi:10.1300=J082v45n02\_03
- Galvin, K. M. (2006). Diversity's impact on defining the family: Discourse-dependence and identity. In L. H. Turner & R. West (Eds.), *The family communication sourcebook* (pp. 3-20)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Gates, G. J. (2015). Marriage and family: LGBT individuals and same-sex couples. *The Future of Children*, 25, 67–87.
- Giammattei, S. V., & Green, R.J. (2012). LGBTQ couple and family therapy: History & future directions. In J. Bigner & J. Wetchler (Eds.), *Handbook of LGBT-affirmative couple and family therapy* (pp. 1–22). New York, NY: Taylor & Francis.
- Gianino, M., Goldberg, A., & Lewis, T. (2009). Family outings: Disclosure practices among adopted youth with gay and lesbian parents. *Adoption Quarterly*, 12,

- 205–228. doi 10.1080/10926750903313344
- Goldberg, A. E. (2007). Talking about family: Disclosure practices of adults raised by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parent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8, 100–131. doi:10.1177/0192513X06293606
- Harter, L. M., Edwards, A., McClanahan, A., Hopson, M., & Carson-Stern, E. (2003). *Exploring street journals from a co-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case of Street Wi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Miami, FL.
- Hopson, M. C., & Orbe, M. (2007). Playing the game: Recalling dialectical tensions for Black men in oppressiv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18, 69–86.
- Huisman, D. M. (2014). Telling a family culture: Storytelling, family identity, and cultural membership. *Interpersona*, 8, 144-158.
- Kuvalanka, K. A., Goldberg, A. E., & Oswald, R. F. (2013). Incorporating LGBTQ issues into family courses: Instructor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relative to perceived teaching climate. *Family Relations*, 62, 699–713
- Kuvalanka, K., Leslie, L., & Radina, R. (2014). Coping with sexual stigma: Emerging adults with lesbian parents reflect on the impact of heterosexism and homophobia during their adolescence.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29(2), 241-270. DOI: 10.1177/0743558413484354
- Lee, P.-W. (2006). Teaching as a co-cultural instructor in a diverse classroom. *Transit: The LaGuardia Journal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1, 25–28.
- Orbe, M. P. (1998a). *Constructing co-cultural theory: An explication of culture, power, and communica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 Orbe, M. (1998b). From the standpoint(s) of traditionally muted groups: Explicating a co-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model. *Communication Theory*, 8, 1-26.
- Orbe, M. P., & Roberts, T. L. (2012). Co-cultural theorizing: Foundations, applications & extensions.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23(4), 293-311. doi:10.1080/10646175.2012.722838
- Oswald, R., Blume, L. B., & Marks, S. (2005). Decentering heteronormativity: A model for family studies. In V. L. Bengtson, A. C. Acock, K. R. Allen, P. Dilworth-Anderson, & D. M. Klein (Eds.), *Sourcebook of family theory & research* (pp. 143–165). Thousand Oaks, CA: Sage.
- Ramirez-Sanchez, R. (2008). Marginalization from within: Expanding co-cultural theory through the experience of *Afro Punk*.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19, 89–104.
- Rostosky, S. S., & Riggie, E. D. (2017). Same-sex relationships and minority stress.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13, 29-38.

Shieh, W.-Y. (2010). Gay and lesbian couple relationship commitment in Taiwan: A preliminary study.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57, 1334–1354.

doi:10.1080/00918369.2010.517078

Walton, G. (2005). The hidden curriculum in schools: Implications for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and queer youth. *Alternate Routes*, 21, 18–39.

Yep, G. A. (2002). From homophobia and heterosexism to heteronormativity: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 model of queer interventions in the university classroom.

*Journal of Lesbian Studies*, 6(3/4), 163-176.

#### 四、建議

ICA 這次的線上會議其實已經算是在短時間內籌辦得相當成功的研討會。我今年還有另外一篇論文錄取本應在英國倫敦舉行的 IARR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lationship Research)，但 IARR 的主辦單位僅僅通知延期一年後就不知去向。ICA 能在短時間內回應疫情的變化，並且籌辦出這樣大規模參與人數的會議，我認為相當難得與專業。雖然研討會的註冊費並沒有減免，並且有一些論壇的口頭報告品質（包括上傳時間）因為研究者的科技近用性而有所差異，但我個人還是覺得非常有收獲。我十分肯定 ICA 主辦單位對此次年會的處理與成果。

####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無。僅有線上資料。

#### 六、其他

無。

##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10 年 11 月 30 日

計畫編號	MOST 107-2629-H-128 -001 -MY2		
計畫名稱	「不夠格家庭?」：台灣同志家庭與子女教育現場之共文化溝通研究		
出國人員姓名	李佩雯	服務機構及職稱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系教授
會議時間	2021 年 6/16, 6/29, 7/15, 7/26, 8/11, 8/27, 9/9, 9/20	會議地點	倫敦 原訂在 2020 年夏天舉行，後因疫情改為 2021 年線上舉行
會議名稱	(中文) 2020 IARR 線上國際會議出席成果報告 (英文) Annual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lationship Research, 2020		
發表題目	(中文) 無 (英文) Breaking the typical imagination of intercultural romance: A preliminary study of intercultural intimat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ighly educated Taiwanese women and white men form democratized countries		

### 一、參加會議經過

IARR 以心理學、量化、親密關係研究為主流的研討會，去年因為疫情的關係延遲到今年才以線上分成數天、非同步的方式進行。大家在會議開幕前先分別將事先預錄的投影片、影片檔、海報檔上傳到大會指定的線上平台。

此次我所參與發表的研究為我與性別所碩士畢業生鄭學鴻共同完成的論文：  
Cheng, H.-H., & Lee, P.-W. (2021, August). Breaking the typical imagination of intercultural romance: A preliminary study of intercultural intimat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ighly educated Taiwanese women and white men form democratized countries. The 2020 annual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lationship Research, UK: London (virtual conference, postponed due to COVID-19 pandemic).

我們被錄取的是海報組，發表日期為 8/11/2021，因為我們製作的並非即時論壇影片，很可惜並未收到太多參與者的回應。

### 二、與會心得

除了自己的海報是論文發表外，我亦參與了其他場次不同日期的研究論壇發表，針對我的下一個研究計畫「線上親密關係」進行資料搜集，茲摘錄如下：

1. 8/11 “How romance in the virtual world contributes to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by Dr. Mayu Koike et al. from Hiroshima University, Japan

該研究探討網路上 human to nonhuman agent 關係形成的原因，其中主要討論 ‘romantic anthropomorphism’ 的概念，結果發現：1) a human like voice and the use of touch 是玩電玩或喜歡電玩人物的關鍵 2) 玩者透過 RVGs 希望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或減輕負面壓力 3) 對 virtual agent 的 romantic anthropomorphism 也會影響玩者將人與遊戲 nonhuman 的關係視為具有真實性 4) 作者提到其他的跨文化觀察：日本受試者傾向喜歡漫畫或電玩角色，近似萌文化；英國受試者傾向喜歡由真人扮演或小說中的 drama characters，如哈利波特。

2. 8/11 “The enduring effect of internet dating: what meeting online means for marriage” by Dr. Liesel Sharabi

該研究針對 32 對 online dating (ok cupid) 結婚或訂婚的受訪者進行深度訪談，結果發現：1) 這些受訪者認為其親密關係中比較欠缺 shared background, connected social network, no shared history, 雖然可以超越地域結交親密伴侶，但是初期沒有共同朋友。年輕人現在習慣先從 social media 聊天，之後才會約見面。3) 本研究所調查的親密關係多為 based on self-disclosive, but not intimate relationship。

3. 8/27 “Access to more rejection?: Emerging adults’ perceptions of formation and rejection on online dating sites and mobile dating applications” by Dr. Leah LeFebvre

該研究收回 758 有效問卷，this study highlights how expanding technological romantic relationship access coincides with the difficulty of rejection.

###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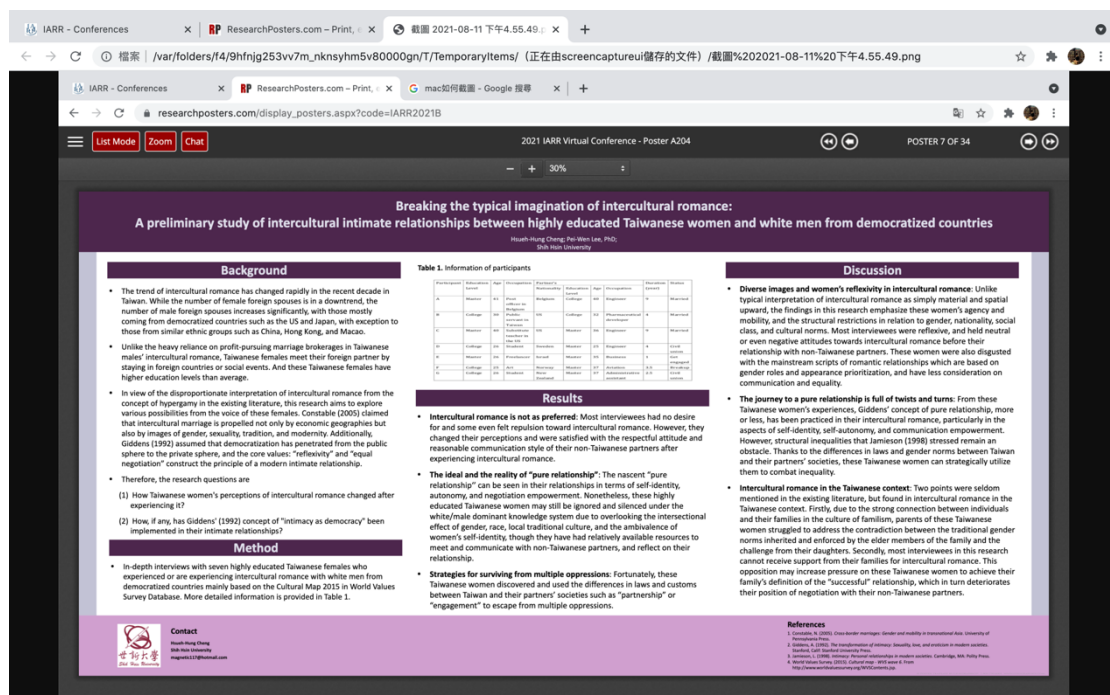
#### Breaking the typical imagination of intercultural romance: A preliminary study of intercultural intimat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aiwanese women and men from democratization countries

#####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how Taiwanese women’s perceptions were changed after experiencing cross-cultural romance (CCR) and how Giddens’ (1992) concept of “democratization of intimacy” was implemented in their intimate relationships. Seven Taiwanese females who experienced or are experiencing CCR with men from democratized countries (e.g., Belgian, Sweden, New Zealand) were recruited for the

current research. Their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he first researcher reveal that: Most interviewees had no desire for and some even felt repulsion toward CCR. However, they changed their perceptions and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respectful attitude and reasonable communication style of their non-Taiwanese partners after experiencing CCR. The participants and their partners demonstrated a similar version of Giddens' concept of "pure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 in CCR. Nonetheless, their democratized communication strategy was still insufficient to successfully fight against patriarchal norms and social regulations. The interviewees thus strategically used the differences in laws and gender norms between Taiwan and their partner's society to escape from patriarchal oppression.

Key words: intercultural intimate relationship, CCR, pure relationship, democratization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 Giddens



四、建議

無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無

107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李佩雯		計畫編號：107-2629-H-128-001-MY2				
計畫名稱：「不夠格家庭？」：台灣同志家庭與子女教育現場之共文化溝通研究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證資料或細項說明，如期刊名稱、年份、卷期、起訖頁數、證號...等)		
國內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李佩雯 (2021/9)。〈家，是動詞：台灣育有子女之同志家庭認同建構研究〉。2021年台灣女性學學會年度研討會。台北：台灣大學。	
		研討會論文	1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國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Lee, P.-W. (2020, May). "Unqualified families?": The co-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of same-sex families coping with the external social links in Taiwan. The 2020 annual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Australia: Gold Coast (virtual conference).	
		研討會論文	1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參與計畫人力	本國籍	大專生	0	人次	郭柏好同學 張福仁同學	
		碩士生	1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非本國籍	大專生	0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其他成果		無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